

陕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说岳全传》丛识

姓名：邹贺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历史文献学

指导教师：周晓薇

20070501

《说岳全传》丛识

邹 赫

摘要：“讲史”（鲁迅分类）小说《说岳全传》影响遍及全国，堪谓妇孺皆知，其之于南宋初年历史的普及作用，不亚于《三国演义》之于汉季三国史。然而不论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错误迭出，难称审慎。这不是由鉴赏水平或持何种文学欣赏理论决定的，在成书年代、作者籍贯、通行本时代等等具体问题尚待澄清的情况下，需要的是从细节着眼，真正解决问题的考证。立意于此，拙文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部分：版本流变

列举岳飞题材的《说岳全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精忠报国传》、《岳武穆精忠传》和《精忠录》五部长篇小说的版本情况，运用避讳的规则，重点分析锦春堂本，推断其为道光本。

第二部分：成书年代研究

《说岳全传》引用了若干评话，这些评话应当可以作为其成书的依据。本文从《飞龙全传》和《听雨轩笔记》中找到了这种连带性质的记述，而且记述的这些评话都是乾隆年间的作品，从而支持了《说岳全传》的乾隆九年成书说。

第三部分：通俗文学作品中所见岳飞题材之演变

例举自南宋以来有关岳飞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不牵涉具体内容的讨论，重点在甄别其中个别作品的作者、沿袭等问题，纠正一些俗成的错误看法。指出岳飞题材的发展趋势是虚构化；原因是这个题材具有的道德、政治含义；过程是从众多相关作品中的一个进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独立作品。这既是逐步积累的必然，也有作者本身兴趣取向的偶然。

第四部分：“华车”小考

（铁）华车是小说《说岳全传》的作者钱彩用来描述一种类似“冲车”、“撞车”的战车。而历史上这类战车的功用并不同于小说的描写。至于其他同题材作品，如京剧《挑滑车》以及小说插图等，无论在名称还是描绘的图像上都是错误的。本文试图从词语源流、史书记载等方面，解释（铁）华车一词的由来及具体形制，以期纠正京剧及小说插图的讹传。

第五部分：杂考八则

举书中八种名物：包巾、坎肩、扎袖、海青、馒头、醋墨、拶指和通书。从

古今史实角度揭示以上名物的实指，考察词义演变、进行语法分析分析词语的实际含义。

第六部分：《说岳全传》辨疑

对现在通行的三个观点：即《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提出异议。拙文用作品内容自证，提出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同时，第一次提出《说岳全传》“钱彩原本”和“今本”的概念。

关键词： 《说岳全传》 版本 成书年代 岳飞题材 名物

Several Notes about *The Life of Yue Fei*

Zou He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novel (classified by Lu Xun) *The Life of Yue Fei*, influences nearly all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It popularize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s history, just as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s function on Eastern Han Dynasty. However, not only academic circles but also readers have s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is novel, which are not rigorous. That's not decided to connoisseurship level or persisted what literature theory. We need to focuses on detail to solve textual research especially when we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circulation age of this book, the native place of the author, the time of the public edition and so on. Embarks from this angle, my strength is solving these problems diligently.

Part I : Edition Changes

In this part,I will enumerate some articles about Yue Fei,such as *The Life of Yue Fei*、*the Revive of Song Dynasty*、*Yue Wu-Mu Jing Zhong Bao Guo Zhuan* (《岳武穆精忠报国传》)、*Yue Wu-Mu Jing Zhong Zhuan* (《岳武穆精忠传》)and *Jing Zhong Lu* (《精忠录》), analyze these five novels' edition situation and the rule of taboo. My emphasis is on analyzing the edition of Jin-Chun Tang(锦春堂) and deduce it is published in Dao-Guang period.

Part II : Study on the Age of the Novel be written

The Life of Yue Fei quotes some storytellings,whitch can be treated as the basis of this novel's age be written. This article finds some record and narrate in *the Tales of Flying Dragon* and *the Notes of Ting-Yu Xuan* (《听雨轩笔记》),and these storytellings were all written during Qian-Long period. That is to say ,this novel was written in Qian-Long period.

Part III: The Evolution of Yue Fei Theme in Popular Literature

List some popular literatures from Southern Song Dynasty till now. The emphasis is distinguishing some popular literature's specific author and it's evolution, correcting some common mistakens,but not the discussing on specific subject. I will point out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of Yue Fei is a process of fabricate

because of this subject has mor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The process is the novel evolving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novels from many related novels.

Part IV: Study on Hua-Che(华车)

(Iron) Hua-Che (华车) is a chariot the author Qian Cai of *The Life of Yue Fei* used to describe which was like Chong-Che(冲车) and Zhuang-Che(撞车). In history, however, this chariot's function is not as the novel's description. As for other samely subject novels, such as Peking opera *Tiao Hua-Che* (挑滑车) and some novels pictures, not only the designation, but also the picture is wrong. My article will expound Hua-Che (华车) from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rms, the record of history books and so on. Also, I will explain the word Hua-Che's (华车) origin and its shape, by doing this, I hope I can correct the misrepresentation about Hua-Che (滑车) in Peking opera and novel picture.

Part V: Composite Textual Criticism on Eight Objects

I will list eight objects: scarf, sleeveless, griped sleeve, Hai-Qing (海青), streamed bun, vinegar ink, Zan-Zhi(拶指) and almanac (通书). Meanwhile, I will bring these objects to light from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inspect these words' development, analyze these words' actual meaning.

Part VI: Debates Doubts on *The Life of Yue Fei*

There are three usual points about *The Life of Yue Fei*, such as: the author of *The Life of Yue Fei* is a Lower level writer;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part and the last part; this novel's predecessor is not *the Revive of Song Dynasty*. On these points, I will use the novel's contents. In my opinion, Qian Cai was a storyteller, Jin Feng is a bookseller, their cultural standard was low indoubtly. There are reasons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vel's first and last part. The influence that the novel *the Revive of Song Dynasty* on *The Life of Yue Fei* is very little, and Qian Cai even had never seen the novel *the Revive of So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I point out that *The Life of Yue Fei* has Qian Cai master copy and now copy two conceptions in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The Life of Yue Fei* edition book in circulation age
Theme on Yue Fei object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
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个人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陕西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
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
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郑 芳 日期： 2017.5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同意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陕西师范大
学。本人保证毕业离校后，发表本论文或使用本论文成果时署单位名称仍为陕西
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它指定机构送交论文
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
入学校图书馆、院系资料室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
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

作者签名： 郑 芳 日期： 2017.5

序 论

以考据之法治小说肇端于近人，蒋瑞藻、孙楷第、叶德均诸先哲建树良多，其间最有名、最有意识地系统从事其间的例子当属胡适之、俞平伯等所倡之“新红学”或称“考证红学”，其诞生即是为区分于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其派硕果颇丰。然百年来成系统者，亦唯此一派而已。以理推之，以考据法治经、史，则自然可以一转而考子部，再转而考集部，乃至三转而考戏曲小说。然古时小说实在难登大雅，《汉书·艺文志》列“九流十家”，不入流者，恰小说家也。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①明清以后文言小说得到合理的对待，但通俗小说仍受歧视，梁启超直言：“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②通俗小说既不受重视，以考证之法治小说成果不显亦在情理之中。民国以降，通俗小说研究亦成显学，然而受关注者，无非《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和《红楼》等寥寥几部而已。仍然有大量的作品被错误地理解、引用，《说岳全传》就是其中之一。

通俗小说的考证之所以成为可能，第一必须有文献互相之间，时间上纵向的继承和内容上横向的引用。《说岳全传》的成书吸收了在此之前的众多民间创作，诸如泥马渡江、胡迪骂阎、疯僧讽秦等传说加以加工利用。作者也同步地加进了个人发挥，使得特定桥段的叙述又自成其说，此例如牛头山一段，其情节在细节部分完全区别于清初李玉之《牛头山》，并导致了后世对二者孰先孰后的争议。相应地，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也为了解《说岳全传》提供了条件。

第二要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丰富的版本系统。就这一点来说《说岳全传》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说岳全传》是通俗读物，一直没有文人参与改编、批注，使前后各种版本的内容出奇的统一，这当然减少了吾辈研究此书的麻烦。缺点就是一直在民间发行，缺少规划和记录，导致一些版本信息湮灭无闻，如钱彩原本，形制如何？是钞本还是刻本？这些问题已经根本无从知晓了。

第三是作者的生平活动文字记录或作为受众的读者对作品的相关记录。这一点是《说岳全传》的重大先天不足，不像《红楼梦》脂砚斋批本里就包含了曹雪芹的重要信息，终清之世《说岳全传》一个批本都没有，更何谈作者信息？即便不似《红楼》，《水浒》、《西游》也有历代积累下来的或真或假的各种资料，足够后世学人利用。然而《说岳全传》的作者钱彩、金丰的历史记录竟然一片空白，就是想歪曲理解、利用史料亦无从下嘴，更别说做出一鸣惊人的突破性研究之类。

①汉班固撰《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页1746，中华书局1975年9月版

②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页10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

《说岳全传》集中了以上诸般问题，而且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现在通行的说法错误迭出，多为无根据的臆测、附会甚至误断，如金丰籍贯、初版年代、故事蓝本谁属等等，殊为憾事。

目下对《说岳全传》的研究论著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主题思想：

①思想评价类：《谈谈〈说岳全传〉》、《对谈谈〈说岳全传〉的意见》、《怎样评价〈说岳全传〉》、《读〈说岳全传〉》、《〈说岳全传〉主题思想评价》、《是爱国还是忠君——评〈说岳全传〉的主题思想》、《试论〈说岳全传〉的主题思想及时代意义》；②人物分析类：《由〈说岳全传〉谈通俗小说天命与因果系统下的英雄造型》、《以岳传的牛皋为例——论中国战争小说的丑角》、《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论金兀术的侠义性格》、《简评金兀术的历史作用》、《传播与接受——岳飞形象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嬗变》、《中国传奇戏剧英雄生成考辨——牛皋、程咬金、焦廷贵》；③故事源流类：《岳传的演化》、《论〈水浒传〉对〈说岳全传〉的影响》、《从〈说岳全传〉最初两种刻本看他的演变过程》、《〈武穆精忠传〉的编者问题》、《〈武穆精忠传〉的编者问题——答阎崇据先生》、《“东窗设计”故事演变中“王氏主谋”说辨析》、《“何立入冥”故事流变研究》、《〈说岳全传〉“说本”来源和乾隆成书说新证》、《“骂阎与入冥”——胡迪故事研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说岳全传〉比较研究》、《岳飞故事演变》、《岳飞故事的流变与时代心态的关系》、《〈说岳全传〉：〈水浒传〉的特殊续书》

第二类、内容情节：

④宗教文化类：《〈说岳全传〉中的因果报应辨析》、《〈说岳全传〉的因果观和道门人物》、《从猪精到大鹏金翅鸟》、《丰都鬼城》、《略说佛典中的金翅鸟》；⑤史实与虚构类：《岳传演义考》、《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

纵观历年来对《说岳全传》的研究，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只关注所谓思想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忠君思想”和“投降派”之类流于表面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无关乎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故事情节却是小说流传的根本原因；二是对《说岳全传》的研究局限在《说岳全传》本身，既缺少纵向的相关岳飞故事来源研究，也缺少横向的与其它小说的比较研究。

①、②二类偏向于文学鉴赏，⑤类只需把史料整理清晰，史实与虚构便可一目了然。真正对认识《说岳全传》有积极作用的是③、④二类。比如对《说岳全传》的故事渊源，如李琳先生即着力于此，有数篇专门文章面世。然而《说岳全传》中这样的题目何其多哉，决非一时一人可以做尽。

拙文着力在文献学角度解决《说岳全传》的问题，使用考证的方法，尽量多

地运用相关资料互相推导，不冒用孤证。

考证并不是现今小说研究的主流，尤其在《说岳全传》的研究中，只能说正在日渐得到重视，这种选择是因为考证的确能解决问题。在没有权威可信的文献记录情况下，仍然要依靠一个“考”字功夫，来解决《说岳全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各版本的沿袭、改编等重要出版信息的缺失。

一、《说岳全传》之版本流变

1、《中兴》、《报国》与《精忠》版本综述

有关岳飞题材的笔记小说最早见于《夷坚志》的记载，主要有三条：《辛中丞》讲岳飞梦中下狱事、《猪精》讲岳飞前世为猪精事、《三公神》讲岳飞军卒挪用三公神庙黄罗幔事。^①接着是元代的话本和明代的一些拟话本，今皆不存。

长篇小说的创作则是从明前期的《精忠录》开始的，今亦不存。然熊大木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云：“《武穆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②可见其时确有这样一部小说。1997年石昌渝先生在日本发现两部朝鲜铜活字本，一部是残本一册，藏仙台市榴岗图书馆；另一部是全本三册，藏东京驹场尊经阁。《精忠录》共六卷，题：“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附赵宽《后序》、朝鲜柳成龙《跋》，从序跋可知此书原刻在弘治十四（公元1501）年，这两部是万历十三（公元1585）年朝鲜翻刻本。^③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精忠录》这部书只知其名，未知其实，因此形成了许多错误的观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不同的但题名却同为《精忠录》的作品，一是前面提到的小说，不知撰者；二是景泰六年（公元1455）印行的汤阴袁纯编辑的纪念岳飞的诗文集，有名士商辂《序》叙其经过。正德五年（公元1510），海阳李春芳整理重版，并撰《序》：“他日读王之《精忠录》……板行已久，颇有脱落。况今有颂王之德，吊王之祠，珠玉相照，皆未登板，亦缺典也。乃躬为厘正而重刻之。即其录，观其事，诵其诗，咏其词，王之生气凛凛犹在也。”^④李春芳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他是在给诗文集《精忠录》“厘正”，因此也称李春芳整理的诗文集作《精忠录后集》。李春芳此书与小说《精忠录》并没有多少关系。

小说《精忠录》的传播情况很不理想，因为早在嘉靖年间熊大木就说自己看到的本子残破不全了，可以推测明中期以后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到过它，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可能把诗文集《精忠录》误当成小说《精忠录》。最典型的例子是万历年间周日校的万卷楼本《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所附“李春芳序”《会纂宋鄂王岳武穆精忠录》三卷。实际上就是李春芳重编的诗文集《精忠录》，却被套上了小说《精忠录》的名字。此外还有清初映秀堂熊大木本、清聚盛堂邹元标本，

①宋洪迈撰《夷坚志·甲志》卷十五，页131、132；《支志戊》卷六，页1098，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熊大木序，1990年出版。

③见邓骏捷撰《岳飞故事的演变》，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3期，页135。转引自石昌渝撰《朝鲜古铜活字本〈精忠录〉与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东北アシミ研究》第2号，日本东北大学东北アシミ研究センター，1998年5月。

④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页150、152、153，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

也把李春芳的序挪为小说之用。这种错误正说明书商不识李春芳《序》书之实，只贪图其名气，不辨版本妄加引用，正是错上加错、乱中添乱。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版本，就是崇祯年间的吴门萃锦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大连图书馆收藏，不题撰人。现在一般把它认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一个版本。笔者通过比较发现，此本不同于熊大木、余应鳌、邹元标诸本。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它为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改编本；二是它可能与小说《精忠录》有渊源关系，这个推测还需要与日本的《精忠录》对照来验证。总之把萃锦堂本当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一个版本是不对的。

小说《精忠录》的版本情况为：

《精忠录》六卷：

弘治十四年初刻本，今不存。

万历十三年朝鲜铜活字翻刻本，三册，题“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藏日本仙台市榴岗图书馆、东京驹场尊经阁。

吴门萃锦堂本，大连图书馆藏，“内封中题‘精忠传’，右上题‘李卓吾评’，左下题‘吴门萃锦堂梓’，卷端题‘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反八卷八十四回，亦不标回次，各卷前有图四叶共八幅，正文有圈点旁勒，眉栏有评，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①

小说《精忠录》是明中期成书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源头，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仍然首推题为“鳌峰熊大木编辑”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它标榜“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②其书流传过程衍化出三个异名：《大宋中兴英烈传》、《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和《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但这部小说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小说家的虚构成分非常明显。熊大木自己就宣称：“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异同者，两存之，以备参考。”^③因此又出现了声称要把它改回到历史著作的又一个岳飞故事的版本，即于华玉删节本《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一般认为于华玉的改编降低了原本小说的艺术性，属徒劳之作，历来评价不高。除于华玉节本外，还有一本题“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精忠传》，实为无名氏假托，也是熊大木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一个删节本。不论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作者被改易还是《岳武穆精忠传》的作者被假托，都是私人书坊的经营手法，与原书两相对照便可知其真相。

此三书的版本著录及收藏情况如下：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八十回

①刘镇伟、王若、韩俊英编《大谷本明清小说叙录》，页86，大连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熊大木序，1990年出版。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熊大木序，1990年出版。

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书堂初刻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珍本版画资料丛刊》皆作“清白堂，八卷七十四则”），又作《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第一行题《新刊大宋中兴英烈传》）（3）

万历年间：

余象斗：双峰堂，《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

三台堂，题“余应鳌编”，《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天津图书馆藏。

周日校（号对峰）万卷楼，《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题李春芳撰《会纂宋鄂王岳武穆精忠录》）。^①图嵌正文中，记画工“王少淮写”，正文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首熊大木序，附《精忠录》二卷，每卷撰人署名後题“书林万卷楼刊行”。此书自余氏双峰堂本出。

仁寿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八十则（2）

崇祯年间：

天德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封面题“李卓吾评宋精忠传”，不题撰人，北京市图书馆藏^②

经元堂（书名同上）六册，有图^③

金陵唐氏富春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

清初 映秀堂，不题撰人，八卷八十则，首李春芳序题《岳鄂武穆王精忠传》，封面题《精忠全传》，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单边。卷首有岳飞、李纲、韩世忠、宗泽像。每卷前附图四叶。眉栏有评。大连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嘉庆年间：三让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年间：两仪堂（书名同上）残本三卷，八册，有图（2）。

明代内府抄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残本三卷^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990年出版。

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之《岳家将·岳王传》，2003年2月版。

未知年代：

①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明清讲史部》，页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马文大、陈坚主编《明清珍本版画资料丛刊》第七册，页223，全书收录，学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认为该版本为顺治年间。

③郑振铎撰《西谛书目》下册《集部中·小说类》，页6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④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明清讲史部》，页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尚论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2)。

节本《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七卷二十八则，明于华玉撰。

崇祯十五年：友益斋，十册^①。

节本《岳武穆精忠传》六卷六十八回，假托“吉水邹元标编订”，真实作者不详。

天启七年：宝旭斋(2)

乾隆三十六年：金闾宝仁堂，六册，有图^②。

乾隆四十一年：文光堂(4)。

乾隆、道光年间：大文堂(2)、六册，书名页题《精忠全传》。

玉茗堂，北京市图书馆藏(2)，六册，封面题“玉茗堂原本精忠全传”。

光绪二年：重庆福源堂《岳武穆精忠传》六卷，四川省图书馆藏

未知年代：清聚盛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李春芳序，四册。

经文堂《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八卷，天津图书馆藏

吴郡藜光楼植槐堂《武穆精忠传》(2)

吉水县衙《岳武穆精忠传》(2)

2、《说岳全传》版本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出现了岳飞题材集大成之作的八十回长篇小说《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这是所有岳飞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流布规模遍及大江南北，坊间刊刻次数极为可观，计有：

顺治年间，宏道堂《说岳全传》，吉林大学图书馆藏

康熙二十三年，金氏余庆堂《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③大连图书馆藏。

嘉庆三年，十册，辽宁图书馆藏^④、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口题：《说岳全传》，书笺题：《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

①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明清讲史部》，页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郑振铎撰《西谛书目》下册《集部中·小说类》，页6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③以上“宏道堂本”和“金氏余庆堂本”的疑问在《成书年代研究》一文中另有阐释，这里不再赘述。金丰序言末句作“予亦乐是说之可以公诸同好，因序数语，以及弁首付之梓。”这句话只能作为金丰组织刊刻余庆堂初刻本的证据，整篇序言里并没有提及顺治或康熙的字样。

④《西谛书目》下册《集部中·小说类》，页6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小说书坊录》引自辽宁图书馆藏书目录，题为“永福金氏刻”，不知根据何来。

嘉庆六年，福文堂 九集八十回，英国博物馆藏^①

道光二十三年，奎璧堂，天津图书馆藏。

同治三年，维扬爱日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2）。

同治九年，务本堂 七十九回木刻本（6）。以此本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说岳全传》构成了建国后主要的版本系统，计有：

1955 年 11 月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 1 版，据同治庚午（1870）木刻本（即务本堂七十九回本）校正、标点排印。

1963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排版。

1979 年 6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②（以上四种竖排）。

1980 年 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标点、横排本。

1982 年 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3 月、1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插图本 董天野绘图。

1994 年 1 月第一版，华夏出版社。

1995 年 1 月、8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9 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大说宋丛书》第 8 部

1998 年 1 月第一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5 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徐小杰点校

2005 年 1 月，岳麓书社《古典通俗小说文库》，陆明点校

同治十一年，金沙剑光阁《绣像精忠演义说岳全传》二十卷八十回，吉林省图书馆藏

光绪六年，奎照楼重刻本（2）。

光绪八年，京都老二酉堂《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三年，上海广益书局 石印《绘图精忠说岳全传》八卷，首都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八年，泉城郁文堂 二十卷，北京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九年孟秋，八册，书首有人物绣像 13 页 26 幅，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精忠说岳全传》天津图书馆藏

①柳存仁撰《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页 144，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6—1986 图书总目》，页 100，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二十卷铅印本（5）。

光绪丙午（三十二年）仲春，上海书局石印本，八册，书首有人物绣像 7 页 14 幅，天津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年间，上海扫叶山房 二十卷，首都图书馆藏；

上海文贤阁，石印《说岳全传》二十卷八十回，吉林大学图书馆藏；

上海文渊山房石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上海文宝书局石印《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

道、咸、同、光年间，维经堂 二十卷（2）。

宣统年间，上海天宝书局石印《增订绘图精忠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元年（1912），上海海左书局《增订绘图精忠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石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

民国二年（1913），上海天宝书局石印《增订绘图精忠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北京图书馆藏。

民国十一年（1922）6 月，上海竞智图书馆，竞智编辑部编《岳飞历史演义》，2 册；

江南印刷局，石印本八卷，四川省图书馆藏

民国十四年（1925）8 月初版，民国二十年（1931）3 月再版，邹达智选辑，上海文明书局《岳传精华》。

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会文堂石印本《加批绘图宋岳武穆公全传》，袁韬壶批，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广益书局，洪炳晖校，《精忠岳传》，二册八十回。

民国三十三年（1944）1 月，文学出版社《精忠岳飞全传》，二册。

民国三十七年（1948）6 月初版，中华书局，《中华文库·民众教育第一集》之《岳传节选》，夏伯矩编^①。

1953 年 11 月，锦章书局^②。

年代未定：

大文堂 二十卷八十回，天津图书馆藏（2）

以文居 《增订精忠演义说本全传》（或作《说岳全传》）八十回（2）

锦春堂 二十卷，大连图书馆藏。此本印刷精良，自 1990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

① 《中华书局图书总目 1912—1949》，页 317，中华书局 1987 年 3 月版。

② 《古籍目录 1949.10—1976.12》，页 318，国家出版局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 1985 年 3 月版。

本小说集成》影印之后成为一时之选，或直接用其为底本，或者用其对参它本，计有：

- 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
- 1994 年 10 月，春风文艺出版社。
- 2000 年 5 月 1 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第二辑。
- 2003 年 3 月，齐鲁书社，《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贺兰山点校。
- 2003 年 10 月，中国长安出版社 《说岳全传图咏》
- 2004 年 8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萃英书局 《精忠说岳》铅印本，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上海广益书局 石印《精忠岳武穆王全传》，首都图书馆藏。

上海珍艺书局《绣像精忠演义说岳全传》二十卷八十回，天津图书馆藏

博雅书屋（2）

奎元堂《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二十卷

杭州三益堂《说岳全传》刻本，首都图书馆藏、大连图书馆藏

木刻本，二十卷八十回，二十册，书首有人物绣像二十页四十幅，方体字，不避讳，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缺首页）

民国 上海尚古山房铅印本，《精忠说岳》二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以下诸本尚未见到原书，因此不知其底本如何。如果不是明确说明另外采用了其它底本，大陆现代出版的《说岳全传》只有两个底本，即务本堂本和锦春堂本，判断这两个本子也很容易，务本堂本“弘”作“宏”，现代版也做“宏”；锦春堂本“弘”缺末笔，因此现代版仍其旧，做“弘”。只要一查这个讳字即可知其底本。

- 1993 年 12 月，岳麓书社
- 1994 年 5 月，巴蜀书社
- 1996 年 6 月，岳麓书社 绘图本，邓邦源、傅显渝、秦中绘制
- 1996 年 9 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1997 年 6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5 年 1 月，江苏古籍出版社

建国后白话改写本：

1956 年，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周振甫编《岳飞》（节本），一册。

1981年4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杨世铎删节《岳飞传》，五十九回。

1981年6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鲁兵节选《精忠岳传》，四十八回。

1981年7月，吉林人民出版社，陈杰改编《说岳通俗演义》，八十回。

2002年11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林可玉改写《岳飞传》

显然，以上版本主要有八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但这只是编辑的不同，其内容并无大的分歧，同样的例子还有九集本和十二卷本，比如上海广益书局就刊刻了八卷本和十二卷本两个版本。以同治九年务本堂本和锦春堂本两相比较，二者的差别微乎其微，只在个别字句，故事情节无出入。以下主要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的锦春堂本。

3、“锦春堂本”时代断定

锦春堂本封面分三栏，中栏大字书名“说岳全传”，右栏上刻“增订精忠演义”，左栏下刻“锦春堂藏板”。眉上横刻“新镌”二字。按凡“重镌”、“新镌”字样前一般都标示有时间年份，此书“新镌”二字位置偏左，可以推测在右侧原有二字年号（详见附图 2-2），又封面栏线及“增”字都有缺损，更可以推定此处必有缺字，原当作“某某新镌”四字。四周单边，单黑鱼尾，鱼尾下题卷数、回数，白口。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方体字，字迹清晰。页面整齐，版式宽展。有简写、异体字现象。有断句。无插图。序和书目有界栏，正文无界栏。封面右下角盖有“写字台之藏书”朱文单行长方印，乃是日本大谷光瑞藏书印，是其藏书中版本较佳者所盖。（见附图 2-1、2-2、2-3）下面细检其避讳情况。

《说岳全传》第二回“泛洪涛虬王报怨，扶孤寡员外施恩”中“陈搏老祖预知此事……故此与他取了名字，遗授玄机。”第五十一回“伍尚志计摆火牛阵，鲍方祖赠宝破妖人”中“认做了是召来的黑虎赵玄坛”第八十回“表精忠墓顶加封，证因果大鹏归位”中“却说无上至尊昊天玉皇玄穹高上帝”、“牛皋乃赵玄坛坐下黑虎”这三句里的“玄”字缺末笔，皆作“𠂇”，是避圣祖讳。第一回“天谴赤须龙下界，佛谪金翅鸟降凡”中“只因有一宦家，姓赵名弘殷，官拜司徒之职，夫人杜氏，在夹马营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那匡胤长大来英雄无比”二句，这其中有世宗讳“胤”和高宗讳“弘”，“胤”字锦春堂本写作“胤”，“弘”字缺末笔，作“弘”。

在第五十五回“陆殿下单身战五将，王统制断臂假降金”中，从“再说曹荣之子名叫曹宁”一句开始，到第五十六回“述往事王佐献图，明邪正曹宁弑父”中“忽见小番来报道：‘不知何故，将曹宁首级号令在宋营前。’”一句为止，共提到“宁”字五十二处，再加上第五十七回“演钩连大破连环马，射箭书潜避铁

浮陀”中“有徐寧传下钩连枪可破”一句，宁皆作“寧”，宣宗讳寧，虽然《史讳举例》中只写：“寧以甯代”，比如咸丰年间许槌刻《洗冤录详义》卷首题名作“海甯许槌编校”，但是“寧”仍然是讳字无疑。因为道光十四年芸叶龢所刊五色套印本《杜工部集》卷十《捣衣》诗：“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寧辞捣熨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就作“寧”，可以肯定当朝皇帝的讳必避无疑，所以从以上二书可以推知“寧”、“甯”都可以用来避宣宗讳。通过以上讳字正可以确定锦春堂本必是道光朝以后的刊本。

再回到第二回“泛洪涛虬王报怨，扶孤寡员外施恩”，其中一句“(花缸)原是员外新近买来要养金鱼的，尚未貯水。”这里“貯”字犯文宗“貯”字讳，依例当写为“贮”，但此处未避，可见刻板于文宗之前。

文宗以下，穆宗、德宗的名讳亦未在书中有避讳，如“载”字依例不避。

接着是第六回“沥泉山岳飞庐墓，乱草冈牛皋剪径”中的“李春送出了仪门”、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的“今有强盗领众来抢仪凤门”和第四十回“杀番兵岳云保家属，赠赤兔关铃结义兄”中的“岳云听得明白，只做不知，出了仪门。”这三句中都有末帝讳“仪”，同样未见避讳。

从以上避讳情况可以确定，锦春堂本是道光本。

另外，《说岳全传》各版本的刊印时间跨度也可以引为佐证，就目前已知的所有版本来看，从嘉庆六年到同治三年六十六年间只有道光二十三年奎璧堂一个刊本，而同治以后每十年左右就有一个刊本。这样锦春堂本是道光年间刊刻在传承上较为合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嘉庆三年本之前，不论把金丰余庆堂初刻本断在乾隆九年还是康熙二十三年，都有个巨大的空白期，乾隆九年是五十四年，而康熙二十三年竟然达到一百一十四年！这从侧面反映了“《说岳全传》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的不可靠。

最后还有锦春堂本本身的质量，锦春堂本页面清晰，整体美观整洁。字体方正，撇拉得很长，但是不同于乾隆盛世时的“精圆软熟”风格，略显僵直。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小说能够刊刻的如此用心，不是经过太平天国战火之后的民间书坊所能达到的水平。

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锦春堂本的刊刻在道光年间，是很珍贵的道咸本，或者至少可以说它的书板是在道光年间刻出的。

结论：本文总结了明清以降《说岳全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精忠报国传》、《岳武穆精忠传》和《精忠录》五部长篇小说的版本情况，指出了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并理清了建国后新版的底本情况。考证现今被普遍采用为底本的锦春堂本《说岳全传》是道光本。

注：文中标记数字的版本记录见《小说书坊录》转引自以下各书：

- (1) 孙楷第撰《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海出版社 1953 年版。
- (2) 大塚秀高编《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汲古书院 1987 年版。
- (3) 杜信孚纂辑《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
- (4) 阿英撰《小说闲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5) 胡士莹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春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
- (6)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该所编，昭和五十年出版。

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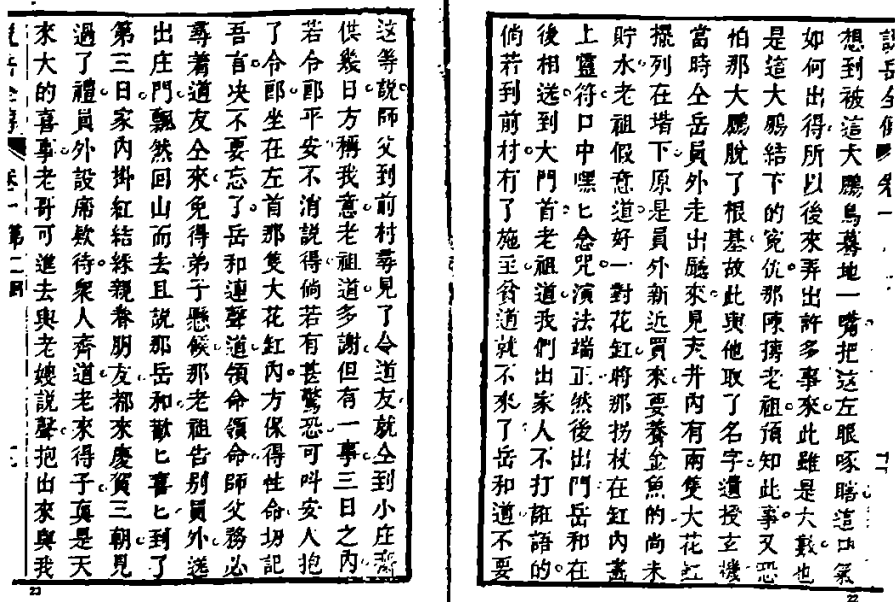


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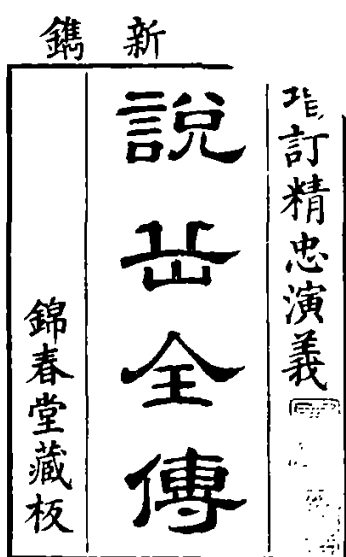


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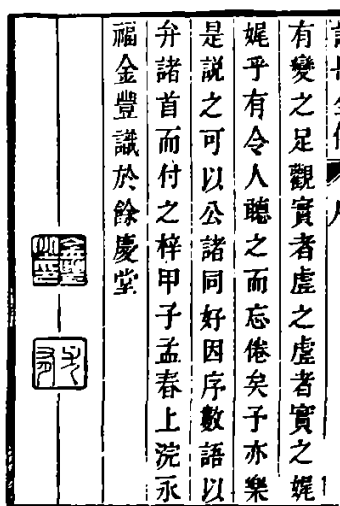


图 2-3

二、《说岳全传》成书年代研究

1、“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质疑

一直以来,《说岳全传》的最终成书时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分歧在究竟是康熙二十三年还是乾隆九年。支持康熙成书说得有《明清小说观止》^①、《明清小说序跋选》^②、《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③等书。支持乾隆成书说得有《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④、《古本小说集成》之《说岳全传·前言》等。还有些书干脆二说兼取,如《中国小说史漫稿》^⑤、《中国小说史》^⑥等。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门讨论的有杜颖陶、李琳等先生的文章,他们都支持乾隆成书说,^⑦但其论证却难称完善,有值得商榷之处。

《说岳全传》题为“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篇首金丰序言的结尾作:“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丰识于余庆堂”。^⑧而此处的“甲子”正是分歧的根源。

现存《说岳全传》最早的两个版本都是嘉庆年间,一是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藏^⑨,书口题:《说岳全传》,书笺题:《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十册,二十卷八十回。

另一个稍晚的是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的嘉庆六年福文堂刻本,九集八十回。“封面横刻:‘嘉庆辛酉新镌’(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正中书名《说岳全传》,右方仁和钱彩先生编次,左为福文堂藏板,附有金丰序言。”^⑩由此可知在嘉庆三年前的某个甲子就是由金丰作序的《说岳全传》最终成书的时间。而嘉庆三年之前的二个甲子依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5)和乾隆九年(公元1745)。

除了上述的嘉庆三年、六年本,《小说书坊录》提到了二个年代更早的本子,但是有疑问,不能断定。一是吉林大学图书馆藏“顺治年间宏道堂刻本《说岳全传》”。此本太过古怪,最大的疑点是“顺治年间”根本不合“甲子”之说,其次也不见它的题名、版式,需要进一步验证。在笔者所见的几种图书馆藏书目,如

①陈绪万、尚永亮编《明清小说观止》,页255,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观止丛书》,1998年2月版。

②大连图书馆参考部《明清小说序跋选》,页148,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③李时人、魏崇新、周志明、关四平撰《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页269,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4月版。

④柳存仁编《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页145,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⑤李梅开撰《中国小说史漫稿》第十四章《明清小说》,页465,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⑥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页2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⑦杜颖陶撰《岳飞戏曲故事说唱集·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李琳撰,《〈说岳全传〉“说本”来源和乾隆成书说新证》,刊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2004年9月。

⑧清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清代锦春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⑨郑振铎撰《西谛书目》,下册《集部中·小说类》,页6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⑩柳存仁编《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页144,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普通古籍目录》里查不到同样的记载，而按《小说书坊录》的说法这个宏道堂本就是“海内孤本”。宏道堂是清代比较有名的书坊，其存在真实性当不用怀疑，所以笔者认为此本还是年代判断的问题；二是大连图书馆藏“金氏余庆堂《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标为康熙二十三年刻本。^①如果此本属实，它将是现存的唯一的《说岳全传》余庆堂初刻本！但从未见任何人对这个本子有具体的描述，而它恰恰是可以为《说岳全传》成书时间提供结论性证据的，这么重要的依据却没人利用说明这个版本本身有问题。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在影印《说岳全传》时，选取的底本却是同馆所藏、年代未定的锦春堂本，试想如果此本真是时间确定的余庆堂初刻本的话，又怎会放着这样的初刻本，弃而不用？所以这个本子所谓的“康熙二十三年”大概也只是没确凿依据的推测而已。1996年1月，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校勘、标点本《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之《说岳全传》。郑荣撰《校点后记》称：“此次校点以金丰于‘甲子孟春’作序于‘余庆堂’的‘校正新镌’本为底本，并参之光绪二十三年戊戌本校点整理。”意思是指采用的底本就是金丰余庆堂初刻本。笔者将它与锦春堂本两相比较，发现二者惊人地一致（可惜未见底本，不能检其避讳情况），据此笔者放胆断言：此本就是锦春堂本，大连图书馆馆藏目录必然有误。

目前尚未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说岳全传》的确切成书年代，持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者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论证，其依据主要有三条：一是《说岳全传》是一部反映民族战争的历史小说，因此清初民族矛盾未定时更符合其产生的背景。这只是一种臆测，事实是《说岳全传》中两大对立角色岳飞和兀术都称得上英雄，作者毫不吝惜笔墨对以兀术为首的金国将领的赞美，如第四十二回“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中对金弹子的赞辞：“相貌希奇，如同黑狮子摇头；身材雄壮，浑似狼狻猊摆尾。双锤舞动，借认李元霸重生；匹马咆哮，却象黑麒麟出现。”接着是金弹子和何元庆对战的赞辞：“两马如游龙戏水，四锤似霹雳轰山。金弹子，拼命冲锋图社稷；何元庆，舍身苦战定华夷。宋朝将士，斫支支咬碎口中牙；金国平章，光油油睁圆眉下眼。你看那两员勇将，扬尘摇土风云变；这时节一对英雄，搅海翻江华岳摇。真个是：将遇良才无胜败，棋逢敌手怎输赢？”第五十六回“述往事王佐献图、明正邪曹宁弑父”中对金将完木陀赤的赞辞：“若不是原水镇上王彦章，必定是灞陵桥边张翼德”接下来描述宋、金两军对峙的赞辞：“那一边意夺乾坤，拼得你死我生；这里忠心报社稷，

^①韩锡铎、王清源编《小说书坊录》，页25，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博个拜将封侯。”把金国将领比作中华英雄，不吝溢美之辞。这些恰恰说明作者态度超然于民族对立情绪，承认金国也是为了争江山社稷，同时不否认南宋初年将士有为自己前途拼杀的心理。这显然不是有民族情绪的人操持的观点，与清初民族矛盾激烈动荡的现实并不符合。

二是小说出现了明代的职官、地理称谓，因此作者可能是由明入清者。比如林香娥先生的说法：“从小说频繁使用明朝的职官、地理称谓的情况看，小说的作者应该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可将小说出版时间定在康熙二十三年。”^①此言于理不通，试想作者写的是南宋初年的故事，如果把清代官职、地理称谓写入书中，岂非引起读者怀疑：岳飞时代的官名、地名怎么竟与自己时代的一样？而引用明代官职、地名，恰恰表示作者生年距离明代已远，作者没有准确的知识，故以明代官名、地名冒入南宋的故事。如此比较而言，仍以乾隆九年更为合理。

三是乾隆年间归安姚氏刊《禁书总目》^②里有《说岳全传》一书，因此前推到康熙二十三年。乾隆年间禁《说岳全传》的确切时间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十二种……《说岳全传》十本，仁和钱彩编次。内有指斥金人语，且词内多涉荒诞。应请销燬”。^③这个证据的不妥显而易见，因为乾隆九年同样在禁书之前，因此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由此可见，“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本身理由并不充足可信。

2、“乾隆九年成书说”新证

前文提到的杜、李二位先生的讨论都是立足于间接的文献资料来探讨的，本文亦试图引征某些文献记载来印证《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

杜、李二位先生都引用《说岳全传》第十回“大相国寺闲听评话，小教场中私抢状元”里的资料作为论据。杜文云“在第九回里叙述杨再兴和罗延庆在大相国寺里听评话，听到讲‘第七条好汉罗成’。按：罗成是第七条好汉一说是由于《说唐演义》流行起的，《说唐演义》又是乾隆初年才面世的。”^④李文云：“今本《说岳全传》第九回叙杨再兴与罗延庆在大相国寺听评话，评书云：‘第七条好汉罗成’等等，罗成为天下第七条好汉之说始见于《说唐演义》，《说岳全传》既采此说，则成书可能与《说唐演义》同时或稍后。《说唐演义全传》约成书于雍正年间，卷首有乾隆元年（公元 1736）如莲居士序言。据此则《说岳全传》正

①林香娥撰《岳飞题材小说戏曲的历史演变》，页 100，《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 6 月，第 14 卷第 2 期。

②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一编《中央法令》，页 51，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③雷梦辰撰《各省禁书汇考》，页 11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

④杜颖陶撰《岳飞戏曲故事说唱集·后记》，页 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4 月出版。

是成书于乾隆初年的可能性较大。”^①但仔细推敲会发现这条论证是有问题的：

首先在现在通行的《说岳全传》版本中杨再兴、罗延庆听评话是在第十回中，非是第九回，二位先生以其为第九回，可能是根据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据同治庚午木刻本的排印本而说的，这个务本堂本是七十九回，故造成回数的不同。其原文如下：

却说牛皋跟了那两个人走进围场里来，举眼看时，却是一个说评话的，摆着一个书场，聚了许多人，坐在那里听他说评话。那先生看见三个人进来，慌忙立起身，说到：‘三位相公请坐。’那两个人也不谦逊，竟朝上坐下。牛皋也就在肩下坐定，听他说评话。却说的‘北宋金枪倒马传’的故事。正说到：‘太宗皇帝驾幸五台山进香……此叫做八虎闯幽州，杨家将的故事。’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原来与对门一样说书的。这道友见他三个进来，也叫声：‘请坐！’那三个坐定，听他说的是‘兴唐传’。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在枷锁山赴五龙会，内有一员大将，天下数他是第七条好汉，姓罗名成。^②

这里清清楚楚写的是《兴唐传》，并非《说唐演义》。《兴唐传》本身是一部评话，与《说唐演义》前半部分故事梗概相仿，但并不相同。《兴唐传》一直未成书，直到 1956 年才由金受申整理、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所以可以肯定《说岳全传》此处所说的《兴唐传》就是真正的清代评书，并非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说唐演义》。而且若按杜、李二位先生的看法推论，《说岳全传》在此前提到的《北宋金枪倒马传》也应该是成书的小说，但是由《北宋志传》改编而来的《北宋金枪全传》是在道光癸未年（公元 1823 年）成书的，^③而《说岳全传》是不可能引用晚于嘉庆三年的资料的，所以在这里杜、李二位先生的观点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了。

至于第七条好汉的说法也不能认定是《说唐演义》的独创，孙楷第先生云《说唐演义》“盖取之市井伎艺人所说，复以褚书为底本而涂抹之，因成此本。唯其书甚流行于闾里间，书场演说多与之合，而乡村佃民尤津津乐道不置，盖俗人避文就质，所嗜实在此等。”^④可见小说取材于评话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至于说《兴唐传》和《北宋金枪倒马传》是评话也是有文献依据的，《听雨轩笔记》载：“评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如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残

①李琳撰《〈说岳全传〉“说本”来源和乾隆成书说新证》，刊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 153，第 37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

②清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一，页 192、页 194~页 196，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

③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页 56，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④孙楷第撰《戏曲小说书录解題·说唐演义全传》，页 8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

唐、飞龙、金枪、精忠、英烈传之类是已。”^①卷后跋称此部分“馀纪”的文章编辑于“壬子暮春”，考察前文，应当是乾隆五十六年。而《听雨轩笔记》是作者清凉道人二十年游历见闻的笔记，可以推知以上那些评话都是清凉道人在乾隆年间听到过的，那么《说岳全传》的作者在乾隆年间听到并录入书中的可能也就有了间接的依据。

《说岳全传》引用评话“金枪”在书中尚有一处，是第五十五回“陆殿下单身战五将，王统制断臂假降金”里王佐入金营招降陆文龙时，曾给陆文龙讲“骠骠向北”的故事，说孟良盗取了辽邦的名驹“日月骠骠马”，此马入宋后向北嘶鸣，七日不食而死。而在《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和《北宋志传》中却都是说孟良入辽原为的是取老令公骸骨，与马无关，而且此马本就是西羊国进贡给大宋半路又被辽军夺走的，因而它根本不存在向辽邦尽忠的道理。^②《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和《北宋志传》二书均成书于明代，在《说岳全传》成书前已经流行，但《说岳全传》关于辽邦名驹的说法完全与之相左，可见《说岳全传》此桥段的作者没有参考《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而直接取材自评话——可能就是前文所说的《北宋金枪倒马传》（“倒马”二字不可解，疑就是“盗马”之误）。

《听雨轩笔记》还提到了“飞龙”，这是以赵匡胤为主角的评话。相应的小说是《飞龙传》，以及吴璿在此基础上加工写成的、成书于乾隆三十三年的小说《飞龙全传》。把《飞龙全传》与《说岳全传》两相比较，也发现了值得注意的地方。

《说岳全传》第一回与《飞龙全传》第十七回都有关于赵匡胤和陈搏老祖对弈的情节，下面试比较二者的区别。《说岳全传》第一回“天遣赤须龙下界，佛谪金翅鸟降凡”中仙童明月称：“小弟记得当年赵太祖去关西之时，在此地经过，被我师父将神风摄上山来下棋，赢了太祖二百两银子。逼他写卖华山文契，却是小青龙柴世宗、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③《飞龙全传》第十七回“褚玄师求丹疗病，陈搏祖设棋输赢”中写到了赵匡胤与神鬼庄五鬼赌钱，身受鬼邪之气侵袭，病卧华山神丹观，康复后拜访陈搏，因而与之对弈，输了三百两银子，监局作保的是西岳华山仙翁。^④另外《飞龙全传》第七回“柴君贵贩伞登古道，赵匡胤割税闹金桥”中写道“且说又有一位好汉，乃按上界黑虎财神星临凡，姓郑名思，

①清凉道人撰《听雨轩笔记》卷三《馀纪》，页342，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五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0月出版。

②明无名氏撰《杨家府演义》卷二之“六郎三关宴诸将”，卷三之“孟良带马回三关”，收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③清钱彩撰、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一，收入《古本小说集成》，页6、页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清吴璿著《飞龙全传》（上），收入《古本小说集成》，页379~页4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字子明。”^①这也与《说岳全传》中写郑恩为饿虎星有异。

这种差别说明《说岳全传》引用的或者是前文所涉及的乾隆年间评话“飞龙”，或者是旧本《飞龙传》内容，即《飞龙全传》所据原本，其书现佚，故原本《飞龙传》成书年代不得而知，吴璿自序称自己是在乾隆十四年所得，则《飞龙传》成书当在此之前，显然又是以乾隆九年与之最接近。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明末清初在江南活动的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表演的节目中也含有岳飞题材。清初周容所撰《春酒堂文集》之《杂忆七传·柳敬亭》载：“癸巳值柳敬亭天虞山，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②柳敬亭卒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故这里的“癸巳”应当是指顺治十年（公元1653）。可见在顺治末、康熙初，最有影响的说书家那里，仍然以岳、韩合传（最早的王六大夫时是四人合传），在长篇叙事的文艺作品方面，岳飞题材并未独立成章，那么此时骤然产生一部五十万言单纯以岳飞为单一主角的长篇叙事小说，从传承上看似乎略显突兀，不合情理。

总结全文，《说岳全传》中引用的“兴唐传”一条是评话而非小说《说唐演义》；引用的“八虎闯幽州”和“骅骝向北”两条都来自评话“金枪”；引用的赵匡胤与陈搏老祖对弈一条既可能是来自评话“飞龙”，也可能是来自小说《飞龙传》。这其中评话“金枪”（《说岳全传》中写成“北宋金枪倒马传”）、“飞龙”以及小说《飞龙传》最早的文字记载都在乾隆年间。虽然不能否定它们在康熙二十三年前出现的可能，但毕竟暂时没有相关记载的印证。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说岳全传》在乾隆九年成书的可能性要高于康熙二十三年。

^①清吴璿著《飞龙全传》（上），收入《古本小说集成》，页1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见胡士莹撰《话本小说概论》下册，页380，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

三、通俗文学作品中所见岳飞题材之演变

1、宋元时期的说话、杂剧和传奇

《说岳全传》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按林辰先生的说法：“编次是编写、编著的意思……凡是根据一定传说、史料而写成的小说，习惯于署编次。”^①钱彩的创作正是依了一定的传说和史料写成的，因此有必要把有关岳飞的各种题材文艺作品作简单的梳理。

最早关于岳飞的文艺作品出现在南宋度宗朝，《梦梁录》有这样的记载：“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②从《中兴名将传》这个题目推测大约除了岳飞之外，其他中兴名将诸如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也当在演义之列。正如《醉翁谈录》所言：“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③

入元以后，岳飞故事编成了多部以“东窗事犯”为名的杂剧，影印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是现存唯一的元代岳飞杂剧。在元明清三代的各种著作中还可见到其他记载：首先是元代至顺元年钟嗣成撰《录鬼簿》卷上《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孔文卿》条著录《秦太师东窗事犯》一本，小字注又名《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卷下《方今才人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仙〉曲吊之》著录：金志甫名仁杰作《东窗事犯》小字注“次本”。^④从钟嗣成的归类可以看出金氏年辈晚于孔氏，那么金氏《东窗事犯》也必然是孔氏《东窗事犯》的后出之作，故曰：次本。明抄本《录鬼簿》载万历时贾仲明为孔文卿所作挽词称“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⑤，这个“旧本”也是相对于金氏新作说的。《录鬼簿》中所记作品的文学题材细目极为严谨，凡提及乐府、隐语、南吕、诗词都会注明，而金氏《东窗事犯》并没有特殊说明，依其书体例来看，就是普通的传奇无疑。

但是明朗瑛著《七修类稿》卷廿三《东窗事犯》却记为“予尝见元之平阳孔

①林辰撰《才子佳人小说述林》之《编余缀遗》，《明清小说论丛》第二辑，页229，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②吴自牧撰《梦梁录（外四种）》卷二十《小说讲经史》，页19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名著民俗集萃（一）》。《复华篇》应当是《福华编》之误，为廖堂中所写，歌颂贾似道于理宗宝佑四年解鄂州之围事。详细考证见胡莹中撰《话本小说概论》页61，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陈汝衡认为此说不当，但是陈氏自己并没有提出可信的依据。《宋代说书史·第五章 南宋讲史》页75、76，上海文艺出版社《曲艺知识丛书》，1979年10月版。

③南宋罗烨撰《新编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页4，周晓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④元钟嗣成撰《录鬼簿（外四种）》，页21、32、33，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写本至德周氏幾礼居传抄本，1978年4月版。

⑤元钟嗣成撰《录鬼簿（外四种）》，页21，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写本至德周氏幾礼居传抄本，1978年4月版。

文卿有《东窗事犯》乐府，杭之金人杰有《东窗事犯》小说……乐府小说，不能记忆矣。”^①这个说法被清褚人穫在《坚瓠甲集》里沿用，遂成为一时公论。^②郎瑛自己都说“乐府小说，不能记忆矣。”况且郎瑛书成于万历年间，其可信度根本就不如撰写本朝事迹的《录鬼簿》。因此“金仁杰著话本小说《东窗事犯》”的结论不可信。历来戏曲论述也并非全采郎、褚之说，如清焦循《剧说》卷五写道：“孔文卿有《秦太师东窗事犯》剧，金仁杰亦有之，惜不传”，这也表示孔文卿的《东窗事犯》一直在流传，或许可以大胆地断为《元刊杂剧三十种》本。

郎瑛的错误大概是他把自己曾经看到过的某种宋元话本误当作金人杰的作品，这就从侧面暗示了岳飞题材——或者说是秦桧东窗谋害岳飞题材——宋元话本小说存在的可能。这类话本、拟话本作品今皆不存。胡士莹认为《喻世明言》卷三十二《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的头回秦桧东窗谋杀岳飞的故事“可能是一个话本的节略”^③但也是推论。目前还没有发现对岳飞题材宋元话本的直接文献记载，因此只能说：可能产生过岳飞题材宋元话本。

2、明代的传奇和小说

明前期英宗朝发生土木之变，忠良于谦临危任事、御敌建功，保全明室江山，但是随后于谦就冤死在政治斗争中。这一事件激起了百姓对岳飞抗金事迹的怀念，岳飞题材遂大行。其中以传奇《岳飞破虏东窗记》和《精忠记》为代表，但是有关作者为孰的争议从明清时就存在了。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云：“《永乐大典·戏文十五》、《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均著录，明金陵富春堂刊本，刊本题《岳飞破虏东窗记》，《南词叙录》于《本朝文》著录《岳飞东窗事犯》一本，下注：‘用（周）礼重编’。当即今之富春堂本。

《寒山堂曲谱》引作《岳忠孝王东窗事犯》。”^④今存万历年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二卷，不题著者，^⑤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郑振铎、叶德均据此更进一步认定它就是周礼重编本。按“用”因形近“周”而误。周礼，字德恭，号静轩，约弘治年间余姚人，隐居南京。著有文言小说《湖海奇闻》、《秉烛清谈》及《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其生平在《杭州府志》、《余

①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廿三《辩证类·东窗事犯》，页24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

②清褚人穫撰《坚瓠集》卷四《东窗事犯》，页3、4，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民国十五年柏香书屋校印本，1986年8月版。

③胡士莹撰《话本小说概论·第十四章明代拟话本故事的来源和影响·第一节〈三言〉故事的来源和影响》之《〈喻世明言〉二十九篇》，页549，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

④庄一拂撰《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编《戏文二·宋元缺名作品》，页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⑤周芜主编《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第四册，页616，收录图画一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杭县志》以及《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中都有记录。^①

现存开明书店《六十种曲》本《精忠记》，原本是明末汲古阁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题作“明无名氏著”。明吕天成撰《曲品》小字注提到“（金丸、精忠、双忠）以上三本武康姚静山作”^②这个说法在高奕撰《传奇品》中被沿用“精忠，姚静山作，岳武穆事。”^③姚静山就是姚茂良。那么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呢？郑振铎、叶德均都对姚茂良之说提出了异议，尤以叶德均先生的考证最为翔实，澄清了明清以降各种曲论及校本的错误沿袭：

金丸、精忠二记并为无名氏撰。各种《曲苑》本吕氏《曲品》卷下于《双忠》下注“武康姚静山作”，卷上论作家亦谓：“武康姚静山仅存一帙，惟睹《双忠》。”均为姚茂良所作惟《双忠》一记耳。祁氏《曲品》以《双忠》属姚茂良（五四页），以《金丸》、《精忠》属无名氏，盖亦据吕氏《曲品》。至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始以《金丸》、《精忠》二记并属姚作。清人《曲海目》、《传奇汇考》、《今乐考证·著录》、《曲录》卷四均沿其说。至暖红室校订本、吴梅校本之《曲品》，又于《双忠》下增注“以上三本武康姚静山作”，于是《金丸》二记均为姚作说又增一层烟幕矣。嗣后或以为：所谓“仅存一帙”者，盖吕天成万历壬寅著《曲品》时，目睹这仅《双忠》一帙，非谓茂良所著唯一帙耳。其意盖谓《金丸》、《精忠》乃吕氏后来增补者。此亦非确论。该其实吕氏《曲品》真相未明，又无祁氏《曲品》印证，且不知“以上三本”乃今人之增益也。^④

由此看来还是汲古阁本的说法更为合理。

《精忠记》是《岳飞破虏东窗记》的改编，具体改编已经由赵景深先生在《戏曲小说丛考·所谓〈精忠记〉》一文里做出了考证。周礼是弘治年间人，姚茂良是成化时人，虽然时间跨度并不很大，但姚茂良毕竟生年更早，不符合《精忠记》晚于《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史实。具体来说，周礼曾经为成化十二年商辂奉敕撰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做注释，则其生年必在此之后。如此可以把明前期岳飞题材的传奇的沿袭关系推论如下：

原本《岳飞东窗事犯》（元孔文卿？撰）→富春堂本《岳飞破虏东窗记》（明弘治间周礼重编）→汲古阁本《精忠记》（明无名氏撰）

此外《远山堂曲品》还著录有一部《阴抉记》，题青霞仙客撰，并称此作前

①详细考证见刘修业撰《古典小说戏曲丛考》，页65-67，作家出版社1958年5月版。

②元钟嗣成撰《录鬼簿（外四种）》之吕天成撰《曲品》卷下，页316，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华上编版），据明写本至德周氏幾礼居传抄本，1978年4月版。

③元钟嗣成撰《录鬼簿（外四种）》之高奕撰《传奇品》卷上《古人传奇总目》，页341，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华上编版），据明写本至德周氏幾礼居传抄本，1978年4月版。

④叶德均撰《戏曲小说丛考》上册《祁氏〈曲品〉、〈剧品〉补校》之《金丸、精忠》条，页206、207，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半部分与《精忠》同，后半稍加改窜。由此可知《阴抉记》也是《精忠记》或者《岳飞破虏东窗记》的改编之作。另外“《舶载书录》又有青霞之《新编神全金鼓雷岳电报仇武穆阴报东窗记》上下二卷”，^①杜颖陶由此认为两个“青霞”是一个人，因此怀疑与《阴抉记》实为一书异名。笔者以为杜氏这个推断牵强，因为文士名号中带“青霞”者多矣，如嘉靖时有“青霞先生”沈鍊；康熙时有“青霞寓客”，著有杂剧《北孝烈》。而且《新编神全金鼓雷岳电报仇武穆东窗记》中的岳雷、岳电指岳飞后代，而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岳飞后代复仇的故事也是明末才产生的《续精忠》（即《小英雄》），时间上必定晚出于《精忠记》。万历庚戌（1610）时，吕天成说：“余欲作一剧，不受金牌之召，直抵黄龙府，擒兀术、返二帝，而正秦桧法。亦一大快事也。”^②可见在万历时期尚无对岳飞故事作“补恨”式描写的作品，因此不能草断《阴抉记》就是《新编神全金鼓雷岳电报仇武穆东窗记》。

嘉靖三十一年熊大木撰长篇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岳飞题材的发展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它并非凭空出世，熊大木《序》称：“《武穆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③表示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前就已经有《武穆精忠录》存在，但这部书现今以在大陆失传。1997年石昌渝在日本发现两部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全本三册，共六卷，题：“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附赵宽《後序》、朝鲜柳成龙《跋》，从序跋可知此书原刻在弘治十四年，这两部是万历十三年朝鲜翻刻本。^④

题为“鳌峰熊大木编辑”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标榜“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⑤其书流传过程衍化出三个异名：《大宋中兴英烈传》、《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和《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但这部小说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小说家的虚构成分非常明显。熊大木自己就宣称：“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异同者，两存之，以备参考。”^⑥因此又出现了声称要把它改回到历史著作的又一个岳飞故事的版本，即于华玉删节本《岳武穆尽忠报国

①叶德均撰《戏曲小说丛考》上册《祁氏〈曲品〉、〈剧品〉补校》，页207，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②元钟嗣成撰《录鬼簿（外四种）》之吕天成撰《曲品》卷下《能品九 精忠》，页316，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写本奎德周氏穉礼居传抄本，1978年4月版。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熊大木序，1990年出版。

④见邓骏捷撰《岳飞故事的演变》，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3期，页135。转引自石昌渝撰《朝鲜古铜活字本〈精忠录〉与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东北アシミ研究》第2号，日本东北大学东北アシミ研究センター，1998年5月。

⑤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熊大木序，1990年出版。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熊大木序，1990年出版。

传》。一般认为于华玉的改编降低了原本小说的艺术性，属徒劳之作，历来评价不高。除于华玉节本外，还有一本题“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精忠传》，实为无名氏假托，也是熊大木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一个删节本。

明中后期岳飞题材的其他作品有传奇《精忠旗》，李实梅草创、冯梦龙更定，是《精忠记》的改编本。存墨憨斋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收；《续精忠》，又名《小英雄》，作者汤子垂；《金牌记》作者陈衷脉，《远山堂曲品》收；以及《救精忠》，作者祁麟佳，书佚，《远山堂剧品》著录；《关岳交代》，作者凌星卿，同为《远山堂剧品》著录。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存也是园抄本，中国戏曲出版社《孤本元明杂剧》收。

3、明末已降的传奇、杂剧、弹词、小说和评书

明末清初之际，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作者群仍然喜欢岳飞题材，创作有传奇《如是观》（又名《翻精忠》、《倒精忠》），高奕撰《传奇品》记作者为张大复，又名张彝宣，字星期，一字心其。^①《曲海总目提要》记为“闻系明末时吴玉虹作”。^②《岳飞戏曲故事说唱集》收。黄文旸、董康之说缺乏证据，高奕之说较为可信，吴梅为张大复撰《快活三》的所作的题跋称：“吾乡张大复……著传奇二十三种，《如是观》、《醉菩提》最脍炙人口，今歌场中尚未绝响也。”^③可为证。张大复现有文集《梅花草堂文集》十六卷存世，阿英就收藏一部，但是没有公开出版；《牛头山》，作者李玉。^④《牛头山》和李玉的另一部作品《清忠谱》都涉及到《说岳全传》，历来有二者孰先孰后的争论。笔者的观点是二作自有所本，相互之间并无继承关系，此不赘述，另见他文；《夺秋魁》作者朱佐朝，为《岳飞戏曲故事说唱集》收。到乾隆九年，出现了岳飞题材集大成之作的八十回长篇小说《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这是在所有岳飞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流布规模遍及大江南北，坊间刊刻次数极为可观。

《说岳全传》一书整合了各时期关于岳飞的不同传说，除了不受金牌召而北上黄龙府的《如是观》，因其故事主线相去甚远而未采用。是名副其实的“全传”，

①元钟嗣成撰《录鬼簿（外四种）》之高奕撰《传奇品》卷下，页348，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写本至德周氏几礼居传抄本，1978年4月版。

②清黄文旸撰，董康、吴梅等校《曲海总目提要》第一函第五册，页11，卷十一《如是观》，大东书局，民国19年5月铅印本。

③张大复撰《快活三》之吴梅《跋》《古本戏曲丛刊三集》第十函第十册，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川抄本。

④清李玉撰《李玉戏曲集》，页669，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陈古虞、陈多、马贵圣点校，2004年12月版。

这种统一也使之前多种题材、多种内容丛出的局面戛然而止，从此岳飞题材的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要向《说岳全传》看齐，以京剧为例，从《汤阴县》到《胡适骂阎》三十六本，无一与《说岳全传》的内容矛盾，而弃之前业已存在的昆剧剧本于不顾。倒是一些地方戏曲保留下了一些与《说岳全传》不合的内容，如秦腔《回府刺字》中岳飞是从军十二年后返乡，而岳母所刺四字乃是“尽忠保国”等等。

道光年间京师艺人吴金凤创作杂剧《快人心》，演岳云骂秦桧事，今佚。^①道光十年周乐清著《补天石传奇》八种，其第六部《碎金牌》写岳飞不受金牌召，直捣黄龙府。全称《岳元戎凯宴黄龙府》，共六出。稿本藏山东图书馆，有道光静远草堂原刻本，咸丰五年静远草堂重刻巾箱本。^②

同治戊辰至光绪乙未年间，周颖芳以《说岳全传》为基础，改编创作出《精忠传弹词》上下卷，共七十三回。其文以七至十二言联目，删除了大鹏临凡、女土蝠转世因果等内容。有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还有两部难以确定朝代的作品，《龙虎啸》，作者佚名，演岳云战牛头山事，《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收；《后岳传》，今佚，《曲海总目提要》著录。

建国后，岳飞题材仍然不衰，又出现了《说岳全传》的多种改写本，计有1956年，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周振甫编《岳飞》（节本），一册；1981年4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杨世铎删节《岳飞传》，五十九回；1981年6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鲁兵节选《精忠岳传》，四十八回；1981年7月，吉林人民出版社，陈杰改编《说岳通俗演义》，八十回；2002年11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林可玉改写《岳飞传》。这些改编本一是采用现代汉语写作，二是彻底去掉原小说中的因果报应以及神话色彩。20世纪80年代初，由刘兰芳、王印权改编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别名《岳家将》）是对《说岳全传》一次成功的再创作，这次改编重点修改后半段岳雷的故事，使情节更加合理、叙述更加通畅。尤其经由刘兰芳先生在电台的演播，造成巨大轰动，堪称80年代初一大社会文化现象。其文本后来整理成《岳飞传》，由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纵观岳飞题材文艺作品的历史演变，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史实与虚构历来是取舍的焦点，虚构最终战胜史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著作，因此虽然各种杂剧、传奇、小说在演义中犯下不可胜数的常识性错误，但是这个题材仍然一路发展到集所有虚构之大成并更进一步神话化的《说岳全传》；二是岳飞事迹本身具有的政治含义，民族问题、忠奸问题屡屡被各个时代利用，甚至

①庄一拂撰《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编卷八《杂剧五·清代作品》，页78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②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页774，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解放后亦然，这也促成这个题材盛行的因素；三是岳飞题材在初始阶段与中兴四将并列，直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李纲、韩世忠的戏份仍然不少。是诸多传奇、杂剧把岳飞忠孝一面过分宣扬，才使得岳飞形象逐渐高出一筹。因此不能忽视了关于其他将领的作品，如传奇《双烈记》、《宗泽交印》等，以岳飞一点代替整个一面，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关于岳飞题材故事还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江南产生的作品多过北方。这首先反映了江南地区的文化水平，其次也多少证明岳飞在江南的影响力高于北方。

四、“华车”小考

1、“华车”的词义演变

京剧《挑滑车》是家喻户晓的武戏名段，小时候听刘兰芳先生讲《岳家将》，这一段又是最让人扼腕叹息、为古人落泪之处。但读钱彩撰、金丰增订的《说岳全传》时却发现了问题：第三十九回“祭帅旗奸臣带畜，挑华车勇士遭殃”中提及“华车”、“铁华车”共十处（含题目），唯独没有“滑车”二字，那么此“华车”就是彼“滑车”吗？这“华车”究竟又是种什么形式的装置呢？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粗略的梳理。

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说岳全传》^①第三十九回中的原文：

（高宠）便拍马抡枪来到番营，挺着枪，冲将进去。小番慌忙报知哈元帅。哈铁龙吩咐快把铁华车推出去。众番兵得令，一片声响，把铁华车推来。高宠见了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枪一挑，将一辆铁华车挑过头去。后边接连着推来，高宠一连挑了十一辆。到得第十二辆，高宠又是一枪，谁知坐下那匹马力尽筋疲，口吐鲜血，蹶将下来，把高宠掀翻在地，早被铁华车碾得稀扁了。

配合这段文字《说岳全传》有幅插图，选自清末民初的石印本，应该是所见的最早描绘华车的插图（见图4-1）。这幅图并未描绘华车的车体，只是一只带齿轮的车轮，这说明作者似乎也不清楚华车究竟是个什么样式。

再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现代人所画的插图（见图4-2）。这张图里的华车是副轮轴，后面伸出一根直木，应该是维持平衡之用。中间的车轴装有刺刀，可以在滚动中造成杀伤（这幅图也曾作为《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的封面出现）。又有连环画《说岳全传》之四《牛头山》也承袭了同样的构造（见图4-3）。

这种构造典出何处不得而知，但1980年版小说插图所画车轴上的刺刀长度已经超过车轮半径，这如何还滚动的了？而连环画所画刺刀长度远小于车轮半径，又如何伤得着人？（而且连环画中写作“铁滑车”更是没有根据。）

华车最早出现在小说第十七回“梁夫人炮炸失两狼，张叔夜假降保河间”中，首先是梁红玉布置两狼关防务时说道：“尔等诸将们可将铁华车摆列端正，把大炮设防三山口上，等那番兵近关，一齐推出铁华车挡住……”。之后是兀术进了两狼关，“查点了仓库钱粮，看见那铁华车，便问军师：‘此车何人置造？’军师回说：‘昔日韩信造此车，困住了西楚霸王。’”^②按这两处文字反映的信息，似

^①清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十，页871，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以上两句分别见于清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五，页356、页362，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乎表示华车是种防御武器，与文献中提到的“刀车”在功用上很有几分相似。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编集的《三才图会》在“刀车”图上方有段文字说明云：“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刃密布之。凡为敌攻坏城门，则以车塞之。”（见图4-4）

这种车似乎不像是《说岳全传》小说中作为进攻方的金兵应该配备的装备，而且这种刀车的高度达到了城门大小，客观地讲凭个人一臂之力实在难以举得起来，枪杆也不能撑得起如此重量。最主要的是这种车的移动能力很差，并不能如小说所写那样推出去冲击敌人。因为它上大下小的结构使得它在脱离人的操纵后很难在高速运动中保持平衡，因此它断不会是高宠所挑的华车。

由此可知，小说中对华车的配图是含混不清，甚至是错误失实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铁华车？它又是什么样式的呢？

华车最初的词义并不是战车。“华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作的楚辞《九叹》：“平明发兮苍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盖而蒨华车兮。”^①《说文解字注》载：“华，荣也。”^②这里的词义就是指装饰豪华的高级车。这同时也是最广泛使用的词义，散见于各代文学作品中。如：“庄蹻肆淫虐，玉食驱华车。”^③、“骏马簇游龙，华车集芳陌。”^④、“宫殿春移九芝盖，云烟画下五华车。”^⑤、“摇光正当寅，华车出广陌。”^⑥这些华车都是指高档车，甚至可以引申为奢侈的生活。这个词义一脉相承，并未有过变化。史料中也有这种词义的用法，时间是宋代：“……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图，华车之使造廷，则百万之师不复出矣。’”^⑦这是宋太祖对南汉后主刘鋹说的话，意思是要求南汉派使者到汴梁来，言下之意就是投降，那么这个使者当然是最高等的，华车就是这种身份的象征。

华车作为专有名词最早的记载是《三国志》，“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幡，时人号曰竿摩车。”注引《献帝纪》云：“……（董卓）更乘金华皂盖车也。”^⑧书中称董卓当时“势逼天子”，可见这金华车是属于皇家车仗的。稍后晋代又出现了以“建华”为名的皇家车仗，“建华车，驾四，凡二乘，行则分居左右。”“次鸾旗车，中道，建华车分左右，并驾驷。”^⑨这种车以

①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十六《章句第十六》，页284，中华书局，2002年10月版。

②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六篇下，页275，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版。

③宋曹勋《松隐集》卷二《长夜吟并序》，页33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1987年版。

④明王绅《继志斋集》卷一《升仙桥别林嘉猷二首》，页67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34册，1987年版。

⑤明刘嵩《棧翁诗集》卷五《栖霞观》，页40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27册，1987年版。

⑥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四十《贡师泰玩斋集·游西山次周伯温韵》，页8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469册，1987年版。

⑦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卷六十《南汉三·后主本纪》，页866，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

⑧《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页176、178，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

⑨《晋书》卷二五《舆服志》，页755、758，中华书局1998年版。

后各代都不再出现，是晋代独有。另外《御定分类字锦》提到了“瑶华车”：“瑶华车，《拾遗》记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之□，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①此云为周成王时代的车，因其转引他书，故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其雍容却可见一斑：五色玉、赤象。而且这还只是异邦进贡之车，非是周王室用车。

但不论金华车、建华车还是可能存在的瑶华车都只是高级礼仪用车，与战车联系不大。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建华车是分居左右排列的，这包含有拱卫的意思，也就暗示了建华车具有一定的战车性质。问题是建华车只在晋代出现过，以后各代不见。换句话说，作为专有名词的“华车”这个词意，在晋代以后是不存在的。

华车真正与战车的词义结合起来是出现在明代的《武编》中，“比者帅臣造华车弩，而箭用索翎……”。^②作者唐顺之，明嘉靖时人。“比者”一词表明“华车弩”是明代发明，但它是长距离攻击武器，并不同于《说岳全传》小说中的描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明代，华车的词义开始包含战车了。到清代这个词意就确定下了，清初查继佐著、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的《罪惟录》载：“宁王权统塞上，城九十，带甲八万，华车六千。”^③这里的华车是广义的战车，而不是特指的某种具体功用的战车。因为统九十城的朱权是独当一面的地区指挥官，手下也必然是诸兵种合成的大兵团，而非一支小规模单一兵种部队，因此装备的战车也必然因为地域、任务的不同而形制有异（甚至可能包含有后勤车辆）。另外《罪惟录》第五十六页写作“革车”，革车就是兵车，仍然包含在战车的词义中。

华车产生战车的词义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华车”乃是“革车”之误，因“華”与“革”字形接近，传抄中很容易出现鲁鱼亥豕之讹，或许华车的战车词义正是因此比附而来。即便如此，革车指兵车，也就是先秦马拉、搭载三人的“乘”，与《说岳全传》中的描写并不相符（具体分析见下文），总之笔者认为，钱彩在这里使用的华车绝对不是兵车的词义。

那么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清初华车可以统称战车一词。而前文已经考证《说岳全传》成书在乾隆九年（1744）。而钱彩、金丰生活时代定然更在此之前，与查继佐大致处于同一时代，他们所说的华车也就应该与查氏所说的“华车”词意相同。换句话说，小说《说岳全传》里所谓的“（铁）华车”犹言“（铁）战车”，

①清何焯、陈鹏年撰《御定分类字锦》卷二七，页209，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006册，1987年版。

②明唐顺之撰《武编》前集卷五，页42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727册，1987年版。

③清查继佐撰《罪惟录》卷四《诸王列传》卷四，页47，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3年版。

就是用来描绘一种大质量的冲击性战车，而非真的存在过一种叫（铁）华车的战车。

2、《说岳全传》里华车的实际形象

以上的讨论只针对词语的源流、衍变，还是没有解决前文提出的华车是什么样子的。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回到小说原文，从前面的小说引文可以得到以下基本信息，第一、（铁）华车是一种冲击性战车；第二、其驱动力靠人推，不是马拉；第三、它不能载人。

符合上面这些标准的战车是存在的，《宋史》记载，皇祐元年有人进献“冲阵剑轮无敌车”。^①《明史》记载：“弘治十年，陕西总制秦紘请用隻轮车，名全胜，长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②（这种车很奇怪，独轮，而且载人。那么它如何保持平衡？故疑“隻”字为“雙”字之误。）从“冲阵”、“冲敌阵”可推知它们都是针对人的，而人是可移动的，因此这种车也必然是可控制方向的、快速马拉载人战车。这样一来它们就不符合小说中“推”的驱动方式，因此它们还不是钱彩所指的（铁）华车。

在史籍中还可以找到一类符合此标准的战车，就是“冲车”、“撞车”。

正史中有很多关于这类车记载：“（王寻、王邑）至昆阳山，作营百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负户而汲。”^③

“（诸葛亮）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④“（慕容熙）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⑤“（拓跋焘）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⑥

“（侯君集）又命诸军引冲车、抛车以逼之，飞石雨下，城中大惧。”^⑦“（并州人）后旬余，大发冲车攻城。”^⑧“建德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陷之。”^⑨

“（侯君集）乃刊木塞堑，引撞车毁其堞，飞石如雨，所向无敢当，因拔其城。”^⑩他们不同于剑轮无敌车或者全胜车，而是专用来冲击城墙、寨门等固定目标的。《三才图会》载：“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见图 4-5）这类车不对人，也就没必要安装刺

①《宋史》卷一九七《兵志》，页 4912，中华书局 1997 年 4 月版。

②《明史》卷九二《兵志》，页 2267，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版。

③《后汉书》卷一〇〇《天文志》，页 3219，中华书局 1996 年 5 月版。

④《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页 94，中华书局 1982 年 7 月版。

⑤《晋书》卷一二四《载纪第二十四慕容熙载记》，页 3106，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⑥《宋书》卷七四《列传第三十四臧焘附传》页 1913，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⑦《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页 5295，中华书局 1975 年 5 月版。

⑧《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页 9337，中华书局 1997 年 4 月版。

⑨《旧唐书》卷五四《列传第四·窦建德传》页 2238，中华书局 1975 年 5 月版。

⑩《新唐书》卷九四《侯君集传》页 3826，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出版。

刀一类装备。它们需要的是结实的车体和巨大的质量，所以速度就不会很高。而人群是灵活快速的，如明代戚家军的鸳鸯阵，忽合忽散、随机组合，显然不是这种徒有冲击力、只能直线前进的车对付得了的。即便是前文提到的那些“冲阵车”，如《明史》所言：“皆罕得其用”或“未尝一当敌”。^①至于宋代，虽然宗泽、李纲都有“战车法”，但东渡后也“不以战车为主”。^②更毋论素以马军为主的少数民族部队了。史实也是如此，以冲车、撞车参战的实战记录主要集中在唐以前，可见这种作战工具在宋代已经衰落了。

比较以上二类战车以及前文的“刀车”，又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小说里的（铁）华车，指的就是冲车、撞车一类战车。虽然史实上这类车并不是对人的，毕竟小说中也没有写（铁）华车只针对人。而且它结实的车体结构也使得它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并不违背小说第十七回所写内容。

3、所谓“滑车”

那么“滑车”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易集解·井卦》载：“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虞翻曰：收，谓以辘轳收繻也。”^③《日讲〈礼记〉解义》载：“凡下棺……以一头绕碑间辘轳，而人在碑背碑外负縴而渐以纵之。”^④两文都提到了“辘轳”，据《名义考》载：“南人谓之油葫芦、北人谓之滑车”。^⑤也就是现代人称为滑轮的装置。“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播于地，以滑车也。”^⑥此处就说得直接了。

明代邓玉函著、王徵翻译的《奇器图说》里对滑车有详尽解释：“滑车全体是轮，轮周之侧面，两旁高，中则凹。无辐、无齿、无轴，而有轴之眼空……另有架安轴，而此轮贯于轴上。其滑最利绳转，故名为滑车。南中呼为羊头掣辘者，此也。”（见图 4-6）

需要说明的是两点，首先明人所谓滑车专指定滑轮，不是动滑轮，更不是滑轮组；其次虽然邓玉函是瑞士人，但滑车一名是汉语早已有之的，并非外来词汇。如《宋史·河渠志》载：“……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

①《明史》卷九二《兵志》，页 2268，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版。

②《宋史》卷一九七《兵志》，页 4922，中华书局 1997 年 4 月版。

③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卷十，页 160，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影印四库本。

④康熙年间校编、乾隆元年校校《日讲〈礼记〉解义》卷四八《丧大记》，页 57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123 册，1987 年版。

⑤明周祈著《名义考》卷十二《物部·金井银床》，页 44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836 册，1987 年版。

⑥康熙年间校编、乾隆元年校校《日讲〈礼记〉解义》卷一二《檀弓下》，页 14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123 册，1987 年版。

移船而浚。”^①

滑车的使用是很广泛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煮絮滑车”见诸多种古籍^②。用途是控制重物起吊，进而控制絮棉烧煮时间（见图 4-7）。

行文至此可以做结论如下：第一、滑车必然是滑轮（而且是定滑轮）无疑，不存在战车的词义。“挑滑车”的提法是不成立的。第二、小说中的（铁）华车是笼统的代指一种冲撞性战车，并非实指某种功用独特的车种。第三、华车与文献中提到的冲车、撞车是一回事。

京剧为何会把“华车”误为“滑车”呢？传奇《牛头山》中尚没有提及华车一事^③，可见京剧《挑滑车》纯粹是在《说岳全传》基础上创作的，也就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京剧之初又是师徒口耳传授，并无剧本，加之清初华车一词的词义至此已经湮灭，京剧又是从南方而来，演员不知北方滑车一词的含义，望文生义，以“滑”字更有动感，更符合当时战争的场景，故误为“挑滑车”。另外出身富连成科班的老演员李盛斌的回忆散文《最早的四挑华车》就写作“华车”，^④也可以作为确定“挑滑车”失实的佐证。

附图：



图 4-1：见插图本《说岳全传》，页 263，齐鲁书社，2003 年版。

①《宋史》卷九二《河渠志》，页 2282，中华书局 1997 年 4 月版。

②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九《器用》，页 12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8 月版。；元王祯撰《农书》卷二一，页 58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730 册，1987 年版；明邓玉函著、王微译《奇器图说》卷三四，页 499，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842 册，1987 年版。

③清李玉撰《牛头山》，收入《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页 6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4 月出版。

④李盛斌著《最早的四条华车》，网址 <http://taiwan.com.cn/web/webportal/W4503047/A5306022.html>



图 4-2：见《说岳全传》第三十九回，页 34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图 4-3：见《说岳全传》之四《牛头山》，页 63、65、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6 月版。

刀車
刀車以兩輪
車自後出鎗
外密布之凡
為敵攻壞城
門則以車塞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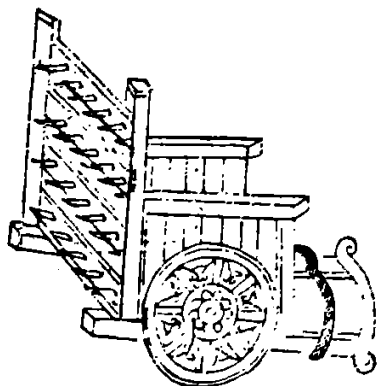


图 4-3: 见明王圻、王思义編集《三才图会》卷五《器用》，页 116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8 月版。

車 撞

撞車上設
撞木制如
槓油
法以鐵葉
裹其首逐
便移從伺
飛梯臨城
則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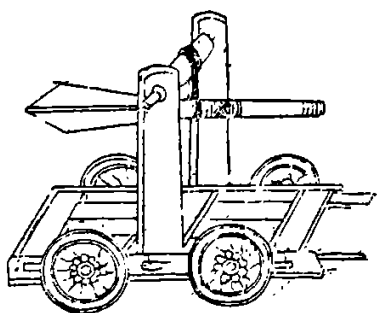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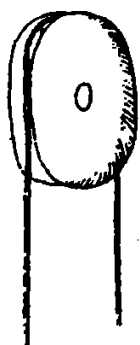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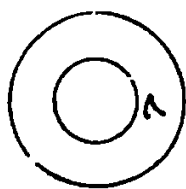


图 4-5: 见明王圻、王思义編集，《三才图会》卷五《器用》，页 11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8 月版。

第四十九款
滑車解



图六：见明邓玉函著、王徵译，《奇器图说》卷二，页 48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842 册，1987 年版。

煮絮滑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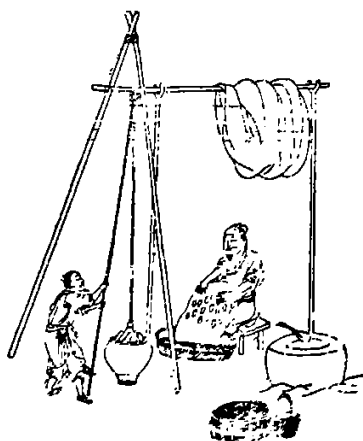


图 4-7：见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九《器用》，页 12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8 月版。

五、杂考八则

尝读陈垣先生《书〈水浒传〉》一文，有言：“独惜《水浒》多中州方言，与吾粤不甚吻合，而今传本又无句豆，故粤人读《三国演义》者多，而读《水浒传》者少。”^①思而不解：《水浒传》用白话，去今不久，何以粤人不通？南、北差异竟一至于此？私谓陈氏之言恐不足尽信。及读浙江钱彩《说岳全传》“疯僧讽秦”讲到：疯僧叶守一把“馒头双手拍开，将馅都倾在地下”，不禁大惑：馒头带馅，岂非包子耶？此北人不识南语之误也，始知陈氏之言实不虚妄。

今读《说岳全传》，检得名物八种，或缘南北语义有差、或缘古今词义不同、或缘古代习见而今人不详者，谨罗举如下，并一一甄别，其或有助于研读此书之同好。

1、包巾

《说岳全传》第五回“岳飞巧试九枝箭，李春慨缔百年姻”：“这件衣服……改一顶包巾”、“（汤怀）头上戴一顶素白包巾”、“（张显）带着一顶绿缎子包巾”、“（王贵）头戴大红包巾”。

包巾泛指包头用的布巾，诸如“旌纛四人，青绣义花鸾袍，悬紫插口，平冕冠二，青包巾二，黄罗抹带。”^②“引舞、乐工皆青罗包巾……引舞二人青罗包巾。”^③皆此例。

以巾裹头始自先秦，从出土的商代玉器人物上便可以看到古人裹巾的形象。裹巾似与冠礼相关，《释名》云：“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④平民无冠，唯以巾配，故苏秦有言：“今窃闻大王之卒……苍头二千又作十万”^⑤，所谓苍头者“谓以青巾裹头，为异于众。”^⑥古时巾、冠区别昭然，外观、质地皆异。吕思勉先生认为巾、帽相近，具体来说巾的原料是葛、麻、帛、丝、棉等纺织品，帽的原料则主要是毛皮，当然亦有一些是用布帛等制成的。巾与帽外观相似，同时又都是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佩戴。然而因为戴巾方便，汉魏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并且使用巾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标志，反而成为文雅的象征。东汉末期，“《傅子》曰：汉

①陈垣撰《书〈水浒传〉》页35，收入《陈垣学术文化随笔》，陈智超、曾庆瑛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十一《礼乐志五》页1767，中华书局1997年7月版

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三》页1652、1653，中华书局1997年3月版

④王先谦撰《释名疏证补》卷四《释首饰第十五》页23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22年本，1983年3月版

⑤《战国策》卷二十二《魏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页180，周晓薇、王其祎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⑥明董说撰《七国考》卷十一《魏兵制·苍头》页333，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版

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①自此文人雅士在非正式场合多戴巾，而不著冠。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就有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四人戴巾。有些名士甚至戴巾去谒见上司，以示风雅，东晋谢万就曾著白纶巾，披鹤氅裘，执手板去拜见会稽王司马昱。^②说明巾的使用逐渐广泛，只要在非正式场合，戴巾者比比皆是。巾的称谓也与日滋繁，有：幘、帔、幘头、四方巾、纯阳巾等等，样式也趋于复杂，其做工精细者甚或与冠无甚差异。

《说岳》中的包巾属于巾之类，在明清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薛仁贵征东》里描写：“（薛仁贵）头戴白绫包巾，金扎额，朝天二翅冲霞色，双龙蟠顶抓红球，额前留块无情铁”、“（番将）头上边都是大红飞翠包巾，金扎额二翅冲天，阴阳带打结飘左右。”^③是巾是冠，恐怕古人亦难细分。

古人观念里的包巾多用于武士打扮，《武编》言：“虚日鼠，鼠头人身，长四尺五寸，面黑黧色，着铁青袍，黄包巾，手执大刀”、“室火猪，猪头人身，长六尺五寸，面玄色，着油黑战袍，绿吊敦，红包巾，跨铁筒。”^④如上描写，古小说尤喜以武将配巾，此或许因袭秦军人只束发不着盔之故习。而《三国演义》里张飞、许褚都有摘盔上阵之壮举，意在突显人物的勇武。

包巾还有一个含义是专为男性使用，严格区别于女性专用之“包头”。女性专用的包头含义有二：一为“额帕”，是女性的包头巾，形制类似男性包巾，《儿女英雄传》中有：“元青绉纱包头”、“大红绉绸包头”^⑤即此。二为戏曲中旦角的行头，“俗呼旦脚曰包头，盖昔年俱戴网子，故曰包头，今则俱梳流水头，与妇人无异，乃犹袭包头之名。”^⑥《儒林外史》也写道：“（戏子）一个个装扮起来，都是簇新的包头。”^⑦

因此，《说岳全传》中包巾，应与《薛仁贵征东》中所描写的包巾意义相同，

①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页54，中华书局1975年4月版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九《谢万传》页2086，中华书局1998年3月版。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的《六朝文化》第八章《六朝社会文化》中“士族的服饰”一部分也引用了这段文字，但是对史料的解读有误，书中写道：“（谢万）着巾晋见皇帝于礼法制度大相违背”云云。这是把谢万所拜会的司马昱的身份搞错了。《晋书》原文是：“简文帝作相，闻其名，招为抚军从事中郎。”很明显，这时候的司马昱还只是宰相，未即位。

③以上二句分别出自清如莲居士著《薛仁贵征东》第三十回“长安城活擒反贼、让帅印威重贤臣”页202，第35回“薛礼大破国城将、苏文失计飞刀阵”页231，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2月版

④以上二句出自明唐顺之撰《武编》前集卷四《二十八宿形象》页395、39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7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⑤以上二句分别引自清文康著《儿女英雄传》第四回“伤天害理预泄机谋、末路穷途幸逢侠女”页55，第六回“雷轰电掣弹毙凶僧、冷月昏灯刀歼余寇”页79，上海书店1981年2月复印1932年亚东图书馆版

⑥清蕊珠川史撰《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页7，上海进步书店石印本，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⑦清吴敬梓撰《儒林外史》第三十回“爱少俊访友神乐观，逞风流高会莫愁湖”，页299，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

配戴在武夫勇士头上，成为表现某类人物的衣着特征。

2、坎肩

《说岳全传》第五回“岳飞巧试九枝箭，李春慨缔百年姻”：“这块大红片锦，做一个坎肩，一幅扎袖”、“（汤怀）……颈边披着大红绒坎肩，两边大红扎袖”、“（张显）……也是红坎肩，红扎袖”、“（王贵）……披着大红坎肩，大红扎袖”。

坎肩是满语外来词，全称“巴图鲁坎肩”，又名背心（某些地区也称马甲），后来代指那些无袖上衣。标准的巴图鲁坎肩四周镶边，正胸横排纽扣，一般十三颗，故南方又称“一字襟”马甲、“十三太保”马甲。它的优点是便于骑射、方便穿脱，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具体穿用之法是“例须用皮者，衬于袍套之中。觉暖，即自探手，解上排钮扣。而令仆代解两旁钮扣，曳之而出，藉免更换之劳。”^①很明显是分作两片曳出，它的特征是无领无袖，今试探其渊源。

这种形制的衣服首先能想到魏晋以来流行的两当（亦称褙裆）衫，《释名》释“褙裆”称：“褙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毕沅曰：……则褙裆字古作两当。”^②可能正是由于其分为前、后两片，分别遮挡前胸后背，故有两当之称。汉魏以来兴起的两当衫其实与一种叫作“两当铠”的铠甲有关，两当铠是汉魏时期士兵作战时穿著的主要铠甲。最初两当衫的制作则是作为两当铠的内衬出现的，目的是防止两当铠磨破里面的衣服，后来军士在不穿两当铠时亦将两当衫穿在外面，因其方便实用而且样式新颖，一度成为武职官员及侍从人员的常用服装。其后，妇女们也穿起了两当衫，如《晋书·五行志》云：“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③《玉台新咏》有：“留一作新衫绣两裆一作端，连置一作著罗裳里。”^④尽管男女穿用的两当衫样式有很大的不同，但两当衫在此一时期流行却完全可能由此得到证明。

清代王先谦认为褙裆是唐宋时期的半背，但是《四库全书》所收唐宋文献中看不到唐宋时期使用半背的记载，^⑤故笔者怀疑“半背”是半臂背子的省称，因为古时半臂、背子经常连用，《名义考》更是直接把“半臂背子”立为一个词条。

①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三册《服饰类》页6191，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②王先谦撰《释名疏证补》卷五《释衣服第十六》页254，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22年本，1984年3月版

③《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页823

④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卷十《近代吴歌九首·上声》页482，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民国24年3月

⑤唯清代傅恒等奉敕撰《皇清职贡图》卷四，页529，记载：“（广西西林县彝人）男花布裹头，裹着半背，携白织锦帕。”但亦未言此半背的具体形制。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4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它们都是唐时服饰，唐玄宗曾命令皇甫询在四川织半臂背子。^①半臂在唐代先为武士服，又为女子服，其“半臂”之意为“半袖”，略同于今天的短袖，只是今天的短袖多为夏季单料制成，半臂则兼有夹层。背子较长（最短的也近于膝处），且有袖，宋代以来男女皆服，只是男女在样式、纹饰上有所区别。不过，宋代的一些记载似乎已将半臂与背子视为一事：“半臂，《实录》又曰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即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②

到了元明时期，又出现了一种叫比甲的服装，据说创始于元代昭睿顺圣皇后，史载其：“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倣之。”^③其中便于弓马的“比甲”，在明代也称罩甲。《酌中志》载：“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如此，束小带，皆戎服也。有织就金甲者，有纯绣、洒绣、透风纱不等。”^④这是它的质地，它的形制是“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皮襖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士大夫有服者。”^⑤沈从文总结它有“有短只齐腰部”的、“也有长将齐足”的，另外有鱼鳞、柳叶、锁子三种组合材料，并提出长度及腰的罩甲在功用上“还像是南北朝的两当”。而《酌中志》所言“透风纱”者则仅起点缀作用，“并无实用意义，和后来背心坎肩已无什么区别。”^⑥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中叶起，女子穿比甲也成为当时很流行的服装潮流了（当然经过了适合女性穿著的特点而改造）并一直延续到清朝。

从时代和外观上推测，满洲坎肩极有可能是上述罩甲的演变，只是长度短了许多，大多齐腰而稍长。不妨大致勾勒一番它的渊源：两当→半臂背子→比甲→罩甲→坎肩。清中叶以后，坎肩早已不局限于军队武士，《红楼梦》中不分男女老少、贵贱亲疏都穿，这是它深入普通大众以后的现象。但在《说岳全传》中则不然，作者在岳飞众兄弟行将赴武举选拔时特意提及，说明它是一种专门的武服搭配装束。

3、扎袖

《说岳全传》第五回“岳飞巧试九枝箭，李春慨缔百年姻”：“这块大红片锦，做一个坎肩，一幅扎袖”、“（汤怀）……颈边披着大红绒坎肩，两边大红扎袖”、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页4513

②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卷三《衣裳带服部第十五》页148，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

③《元史》卷一百一十四《世祖昭睿顺圣皇后传》页2872

④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九《内臣服佩纪略》页172，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版

⑤明李诩撰《戒庵老人漫笔》卷一《罩甲》页4，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⑥沈从文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页46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张显)……也是红坎肩，红扎袖”、“(王贵)……披着大红坎肩，大红扎袖”。

翻检古代服制，并不见扎袖一词，盖民间俗语。相似的用法有“扎腰”一词，即在袍衫外加一条束腰的带子。扎袖意当类此，即扎紧袖口，方便阵前厮杀。然依据《说岳全传》对扎袖的描述，其用“大红片锦”制作，使用的量词又是“副”而不是“条”，可见扎袖非是丝绳、丝带一类条状物品，反而颇似古今皆有的套袖。“套袖者，于做事时加之于袖，以藉衣，不使污损也。一名假袖。”^①此记套袖多用于劳作，而其可用之于战阵乎？因无史料支持，不得而知。然笔者又联想到清代服饰中的箭衣，箭衣袖口有突出于外的“箭袖”，满语为“哇哈”，其形源于北方恶劣天气中避寒而用，待狩猎射箭之时又可卷上，不妨碍行动。以箭袖制作的紧束精悍便于作战的形式来推断《说岳全传》之所谓扎袖者，当含有束袖的意味，其形制大约犹如上述套袖而又如箭袖般紧束袖口手腕部位，以利作战挥刀舞戈时的干净利落。

但是这里的扎袖不能认为就是箭袖，因为箭袖是专有名词，或称马蹄袖，未有称扎袖之成例。

4、海青

《说岳全传》第五回“岳飞巧试九枝箭，李春慨缔百年姻”：“岳大爷把马相了一相，便把身上的海青脱掉了，上前来。”从描述上看，此海青为衣物无疑。

人多知海青为海东青，辽东猛禽也。除此而外，海青其义尚有三：

一曰元代驿站专门用语。《元史》云：“敕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别给海青符二，事有急速，驰以上闻”、“除海青使臣，及事干军务者，方许驰驿”。^②以海青做驿名应该是借喻了海东青飞翔快捷之意，此义项不在本题论述范围之内。

二曰大袖长袍。《清稗类钞》云：“海青，今称僧尼之外衣也。然古时实以称普通衣服之广袖者。”^③又《“稗言”》：吴中方言称衣之广袖者曰海青。按太白诗云：‘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盖东海有俊鹘名海东青，白言翩翩广袖之舞如海东青也。”^④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否唐代已经使用这个称呼了呢？文献上只能追溯到宋代，周密的笔记提到海青，其云：“刘伯宣为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关外俞椀盍家之别室，一夕为偷儿盗去银匙筯两副，及毛衫布海青共三件。”^⑤

①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三册《服饰类》页6202，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②分别见于《元史》卷五《世祖本纪第二》页83、86；卷一百一《兵志四》页2585

③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三册《服饰类》页6192，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④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卷十五《冠服类》页14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11月影印本

⑤宋周密撰《癸辛杂识》续集下《伯宣被盗》页199，吴企明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只是从记载中看不出样式是否为广袖，因知宋代的服饰有此称。《格致镜原》引明代黄一正撰《事物纪原》载：“海青、截裙，宋太祖效南番制。”^①虽然不知黄一正之言出处何在，但综合以上两条文献可以认为海青创于宋代。

三曰黑色布匹。《金瓶梅》第六回王婆有言：“大官人少不得赔我一匹大海青”即谓此。^②这里的语法现象是汉语修辞学的借代，用借体“海青”代替本体“海青式的布匹”。是很典型的借代形式，如同“丫鬟”代“梳丫鬟发型的侍女”、“苍头”代“裹黑色头巾的人”等等。但是此一例中的本体还需要一番斟酌，“海青式的布匹”只是一种权宜的说法。既然是布匹，《礼记》所谓“广袖”显然不合，那么就只能是颜色，具体来说就是海青色布匹。再进一步讲，笔者认为海青色是黑色，因为海青原指辽东猎鹰，鹰羽就是黑色，也就是说，本体就是黑色布。

据此，则知《说岳》中的海青服饰应为广袖袍服。而在宋代这种广袖袍服初兴时何以海青名之？据笔者推测，一是因其广袖飘逸，犹如海青鸟之飞翔，二是取其服色为海东青之黑色。

5、馒头

《说岳全传》第七十回“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疯僧把馒头双手拍开，将馅都倾在地下”。

馒头之名昉见于晋人，“至晋卢谿《祭法》云：‘春祠用𩰫头，始列于祭祀之品。’”^③束皙《饼赋》云：“三春之初，阴阳交至，于时宴享则𩰫头宜设。”^④但是追溯馒头的起源则茫渺无踪可寻。《事物纪原》但云：“稗官小说云：昔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向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则馒头疑自武侯始也”^⑤既然是小说家言，可信度自然有限，然而历来被引作定论，如《七修类稿》不仅采用此说并进一步演义：“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⑥增加“蛮头”一说，实为“层垒地造成历史”的典型现象。

诸葛亮创馒头代替人头祭神之说虽无依据，却也有其合理性，诸如商朝用活

①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卷十五《冠服类》页14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11月影印本

②明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卷二第六回“何九受賄瞞天、王婆帮閑遇雨”页82，收入《李漁全集》第七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③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卷九《酒醴饮食部》页470，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

④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十六《器物部·饼第十七》页642-644，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

⑤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卷九《酒醴饮食部》页470，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

⑥明明琬撰《七修类稿》卷四十三《事物类》页4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人陪葬之制，春秋时改用陶俑代替。如此推测不免有些臆断的成份，而其中可以确定的是晋以前蜀地确有一种带馅的面制食品被称作馒头。

《清稗类钞》记载了清代馒头的情况：“一曰馒首，屑面发酵，蒸熟隆起成圆形者。无馅，食时必以肴佐之。”又云：“包子，南方之所谓馒头……然实为包子。包子者，宋已有之……该其中亦有馅。”^①此论有谬误之处。晋人之馒头带馅与否尚不得知，然唐代馒头带馅却有文字可循：“《朝野僉载》云：‘侯思止食笼饼必令缩葱加肉，号缩葱侍郎。’”^②的确带馅而类似于“包子”。“包子”之称盖始于宋，宋人王栐、陶穀的书中都直接使用：“《燕翼诒谋录》：‘仁宗皇帝诞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清异录》：‘阊阖门食肆逢伏日卖绿荷包子。’”^③其馒头与包子的词义也在此时分化，北方称无馅者为馒头（其后又有馍、饽饽等异名）、有馅者为包子。而南方一仍其旧，有馅无馅统称为馒头。

故《清稗类钞》之语改作“北方之所谓包子者，实为馒头。”方符合历史实际。《说岳全传》对“馒头”的称谓，正是这一南北差别的反映。

6、醋墨

《说岳全传》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岳母刺字）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褪色的了。”

此所谓刺青之法，刺字、图于表皮肌肤，涂醋墨，使字图显黑色纹路。醋墨者，以醋研墨也。醋可化血，有利伤口；墨以着色，可显字图。

中医以醋墨入药，“醋墨法，治产后破血。”^④其义指醋墨可“破凝结之血”。^⑤具体制法为：“以松烟墨不拘多少，用炭火煨通红，以米醋淬之，再煨、再淬，如此七度，研令极细，用绢罗过。”^⑥此药方之制法，刺青所用之醋墨必不需如此精研，盖功用有别也，然道理相近，可谓大同小异。

①均见于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三册《饮食类》页6400、6401，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②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卷二十五《饮食类》页254，同页载：“按笼饼即今馒头，《倦游杂记》：‘唐人呼馒头为笼饼。’”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11月影印本；另外明周祈撰《名义考》卷十二《物部·饼》页435载：“……即今切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侯思正令缩葱加肉者，即今馒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6册，民国七十二年版。除了笼饼，宋人因避讳的缘故又称作“炊饼”。

③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卷二十五《饮食类》页254，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11月影印本

④明朱橚撰《普济方》卷三百四十六《产后诸疾门》页285，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58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⑤宋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卷十八《产后门》页702，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42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⑥明朱橚撰《普济方》卷三百四十五《产后诸疾门》页267，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58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7、拶指

《说岳全传》第六十回“勘冤狱周三畏挂冠，探图圉张总兵死义”写万俟卨、罗汝楫审讯岳飞：“二贼又将岳爷拷问一番，用檀木拶指，命二人用杖敲打，打得岳爷头发散开，就地打滚，指骨尽碎！”

此拶指为刑具，其开端在宋代，“拶指、腿夹者，拷囚具，宋岭南用之。今仍存并见《吏学指南》。”^①郎瑛亦云：“僭指、腿夹，宋岭南用之，即今之拶指、夹棍。”^②古人多以拶指夹棍并称，因二者原理相同，拶指夹手指、夹棍夹腿骨。明人王圻认为：“拶子，旧无是制，想因夹棍而起。”^③拶指只在审讯时使用，不是宣判之后的法定刑罚。“迹来有司往往任情喜怒，以严酷作威，既用拶指、夹棍，复用脑箍、烙铁、竹签以拷未成狱之民。”^④此一句“未成狱之民”可为证。

清代官方规定的形制是“用圆木五根，各长七寸，围径各四分五厘。”^⑤细敲此文可知，一幅拶指只夹四指，盖因五指长短不齐，故拇指不夹。拶指在明清使用普遍：“刑部每年该用……拶指一千三百把，每把用绵绳一条……察院每年该用……拶指八百把，每把用绵绳一条……大理寺每年该用拶指四百四十把，每把用绵绳一条。”^⑥清代规定只允许夹人犯二次，多用则官员违法，盖因其伤害殊大，多夹容易导致冤狱。

或谓《清会典》云：“妇人犯重案不得实，用之。”^⑦故认为拶指为女犯专用之刑。^⑧此说偏颇有误。古代男女有别，量刑自有区分。《清会典则例》载：“如将妇女用夹棍者，亦革职……犯妇有孕亦不得用拶指。违者降一级调用，该管上司不察实具报者，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月。”^⑨其例含有善待女犯之意也。笔者

①明顾起元撰《说略》卷十七《李法》页670，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64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②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四十四《事物类·狱具》页45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这里说的是拶指的起源在宋代。至于夹人手指的刑罚起源更早，秦汉之际成书的《尉繚子》云：“笞人之背，灼人之肋，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见《尉繚子注释·将理第九》页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又《隋书》提到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询囚则用车轴为杖，夹指压踝。”见《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页704，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版。这两处提到的刑具在形制上和名称上不同于宋代以后的拶指，可以认为是它的前身。

③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十一《器用·刑具说》页13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万历王思义校正本

④明温纯撰《温恭毅集》卷五《遵圣谕循职掌摘陈修省要务恳乞圣明严敕中外宪臣实心举行以回天意以保治安疏》页497，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8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⑤清允构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八《刑制》页630，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9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⑥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七《工部七》页948，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版

⑦清允构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八《刑制》页630

⑧杨玉奎著《古代刑具史话》页165，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版

⑨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二十五《吏部考功清吏司·断狱》页469，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0册，民国七十二年版

以为“妇人犯重案不得实，用之”一句之义有两重：一，轻、中案女犯不得用；二，只有重案女犯才与男犯同样待遇，可以使用。男犯用拶指本是平常，因而《说岳全传》中才会描绘岳飞受刑的情景。

8、通书

《说岳全传》第二回“泛洪涛虬王报怨，抚孤寡员外施恩”：“岳安人即取通书，拣定了吉日，搬移出去另住。”

文献所见通书用法有三：一是通信，这个义项最常见，毋庸举例；二是通晓诗书，《新唐书》：“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书史。”^①；三是历书的一个种类。《说岳全传》中就是这个用法。台湾黄一农先生所撰《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②一文，考订翔实，理清了通书的产生、演变、功用等诸般问题。今依据黄文，提炼其主要观点如下，并就其中两个问题补充论述兼与黄先生商榷。

通书的出现可上溯到元代，何士泰、宋鲁珍编纂有《历法通书》三十卷，又有《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新刊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乾集》等。在之前它的演变经历了秦汉“日书”、南北朝“历日”、唐代“具注历”等。通书是历书的衍生品，明清中央钦天监每年要编制供皇室使用的“上历”、“皇太后历”、“东宫亲王历”以及面向民间发行的“民历（皇历）”、“七政历（证七政四余之行度）”。以上各本格式相同，唯因使用者不同而铺注文字有异。

黄一农先生将通书分做两类：一是“综合整理各种选择、神煞的规则与意义”的“百科全书式通书”。二是“官颁历日的增补本”的“年度通书”。^③简言之，前一种讲判断吉凶的方法和理论，后一种直接指出日常生活中吉凶日期。《说岳全传》和其他小说，如《红楼梦》出现的通书都指后一种，随手取过即可查阅搬迁、婚嫁的吉日。这种通书在清代官方文件中也称作“便览通书”。

按《养吉斋丛录》的说法这种“便览通书”：“起自康熙五十年间，徽州治堪舆者编次一年宜忌，以时宪书为君，而杂以选择条款，民间尚之。”^④黄一农先生将这个时间提前，“未见康熙十九年之前所出版的便览通书”，并把它的出现时间定在明清之际。同时还认为康熙十九年，圣祖颁旨不禁止民间刊行，刺激了它的风行。^⑤

①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页3807。

②收入黄一农撰《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页270~3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③黄一农撰《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收入《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页278，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④清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卷六，页62，鲍正鹄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⑤《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收入《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页282~284

从产生、流行到成为百姓日常遵行的圭臬需要一个时间段，或许吴振棫所谓“起自康熙五十年间”乃是指其真正大盛的时间，那么《说岳全传》中描述的现象必然是在此之后的情况，这也佐证了《说岳》的乾隆九年成书说。

另外尚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与黄先生探讨。其一是“通书”一名的含义。黄先生谓：“通书的命名或取‘通天人之际’之义。”^①余谓不然，“通书”之名毫无疑问承自周敦颐撰《通书》，朱熹谓：“《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②可知周敦颐《通书》原名《易通》，则“通书”之意可解为：“通论《易》的思想主题而不拘泥用《易》原文的书。”那么“通论”又当作何理解？朱熹云：“周子留下《太极图》，若无《通书》却教人如何晓得？（大雅）……《通书》一部，皆是解太极说（）”^③朱熹的意思就是揭示阐述的意思，相似的用法可以联想到唐刘知幾《史通》、汉班固《白虎通》等等。这样就豁然明了了，最早的所谓《历法通书》其义乃取“揭示阐述历书主旨的书”，清人亦以指出：“皇历，经也；通书，传也。传以疏经，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也。”^④此一句可资以为证。“通天人之际”恐为黄氏臆断，按司马迁《报任安书》原文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黄氏之“通天人之际”从何而来？

其二，黄氏谓《梁书》、《南史》所记傅昭售卖历日一事，是“历日”一词首度见于正史。^⑤但是这些都是唐人所修南朝史书，不能证明“历日”一词就是南朝北朝词汇。案《隋书·经籍志》录有：“《历日义说》一卷”^⑥道理上当然要先有“历日”以后才能有“义说”，书中虽未注其时代，亦可证明隋以前“历日”已经存在，也就是说《梁书》、《南史》所记确实，非是姚思廉、李延寿使用了唐初的词汇。

①《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收入《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页278

②宋朱熹撰《朱文公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极通书后序》页3652，《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宋朱熹撰《朱子语类》卷九十四《通书》页3144，《朱子全书》第十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④《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收入《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页279，注一，转引自北京图书馆藏《大清康熙五十五年岁次丙申使览全备通书》和《大清雍正二年岁次甲辰使览溪口通书》二书序

⑤《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收入《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页273，注四

⑥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二》页1024，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版

六、“无人会得凭栏意”——《说岳全传》辨疑

1、“刘项原来不读书”——作者生平之疑

目前《说岳全传》研究的最大盲点就是找不出“编次”者“仁和钱彩锦文氏”和“增订”者“永福金丰大有氏”的生平活动资料。

“仁和”清代属浙江杭州府，县制，下有汤镇、塘栖、德胜、临平四镇。^①则钱彩是杭州人绝无疑义。小说中的语言也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称包子为馒头、称外衣为海青等等，都是吴中的习惯用法。“永福”在清代有二县，一是福建福州府永福县；^②二是广西桂林府永宁州永福县。^③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提及金丰时通常把他当成福建人，^④或许是因为金丰安排了余庆堂本的出版，且福建刻书业又较广西发达得多，故而造成这种附会。其实按常理即可推知“某地某人”的写法只表示祖籍，金丰完全有可能籍贯在彼，而身在此。因此现阶段只能说福建、广西二处都有可能成为金丰的祖籍。余庆堂也不是有名的书坊，难查其详实，笔者推测它的所在地大约在江浙地区，尤以苏、宁二地最为可能。因为这里是清中叶刊刻戏曲小说最繁荣的地区，并且苏、宁地区刻书的特征是方体字，虽然余庆堂本今已不存，但是稍在其后的锦春堂本就是典型的方体字，而这两个版本逻辑上是有着继承关系的。

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钱、金二人乃是下层文人。^⑤其实他们究竟是不是文人还难下定论。从《说岳全传》一书中反映出这样的事实：作者对街巷传说的熟悉程度远远胜过对史实的掌握。例如第六回“沥泉山岳飞庐墓，乱草岗牛皋剪径”中叙述周侗去世之年“时乃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行年七十九岁。”按宋徽宗宣和年号起于元年，讫于六年，共六年，何来十七年之说？第十一回“周三畏遵训赠宝剑，宗留守立誓取真才”，这一回提到岳飞在受赠周三畏家传宝剑时讲述了“眉间尺”的一段故事：春秋时期，楚王命韩国人欧阳冶善造雌雄二口宝剑，要能飞起杀人。欧阳用三年铸成三剑，以其中两把献楚王，但终因不能飞起而被杀。欧阳之子七岁时取出第三把剑报仇，路遇一道人相助，以自己的头颅付之。道人见楚王，诈言以油锅烹人头可得长生不老丹，并趁楚王至锅边取丹之际斩其头于油锅之内，随即自刎。楚国臣子只得把三颗头合葬，称“三头墓”。又言此

①近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六十五《地理志十二》页2128、2129，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版。

②《清史稿》卷七十《地理志十七》页2245。

③《清史稿》卷七十三《地理志二十》页2296。

④于天池著《明清小说研究》页264；王宜庭、石昌瑜编著《英雄酒、凡人泪——古代章回小说卷》页100；陈颖著《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页73；李梅吾著《中国小说史漫稿》页465

⑤李绍先、王晓林著《明清小说话幽》页187，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三剑名“湛卢”，薛仁贵得之云云。

按典籍中“铸剑”故事主要有两个版本，原型都在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中，一是今本《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讲干将、莫邪铸剑，莫邪“剪发断爪”投于炉中。^①后来《吴地记》演化为莫邪自己跳入火炉；^②另一是《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讲干将莫邪之子赤比复仇故事。^③到《搜神记》将二者混合，这一故事基本定型。^④

比较之下，《说岳全传》与以上的说法均不相同，而且本身就有漏洞，比如春秋时的故事竟然有道人出现。这说明钱彩、金丰二人引述的根本不是书本记录，而是民间流行的街谈巷语。

第十八回“金兀术冰冻渡黄河，张邦昌奸谋倾社稷”中军师哈迷蚩道：“臣闻得昔日郭彦威取刘智远天下，那时也是八月，天气寒冷，冰冻了黄河，大军方能渡过。”首先这里面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不准确，刘智远“姓刘氏，讳翥，本名知远，及即位改今讳。”^⑤郭彦威“姓郭氏，讳威，字文仲……或云本常氏之子。”^⑥此外郭威还有个外号“郭雀儿”。不难推测“郭彦威、刘智远”之名还是来自评话，应该就是《听雨轩笔记》所谓“残唐”。^⑦其次郭威起兵时间也不对，当时郭威驻军邺都，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十一月丁丑（十四日）举兵，戊寅（十六日）至澶州，庚辰（十七日）至滑州，壬午（十九日）至封丘，甲申（廿一日）击溃慕容彦超，丁亥（廿四日）请立新君，乙丑（廿四日）决定迎立刘赧。^⑧这一历史事件的时间班班可考，头尾皆在十一月份，根本与八月无涉。

此外一些细节，如牛皋本是汝州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人，非小说所谓陕西人。^⑨牛皋之子名僕，非名通。^⑩小说第十五回还说：“有一个总领狼主，叫做完颜乌骨达，国号大金”，名字翻译不对且不说，关键是灭宋时完颜阿骨打早已死去。又有第一回“自太祖开国至徽宗，共传八帝，乃是：太祖……哲宗、神宗、

①东汉赵晔（“四库”因避讳改题“赵煜”）撰《吴越春秋》卷二《阖闾内传第四》页13、14，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463册，1987年版。

②唐陆广微撰《吴地记》卷一，页5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587册，1987年版。

③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四《人事部五·头下》页1675，中华书局复制重印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85年10月出版。

④晋干宝撰《搜神记》卷十一《三王墓》页147，华龄出版社2002年9月版。

⑤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九十九《汉书·高祖本纪》页1321，中华书局1997年3月版。

⑥《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周书·太祖本纪》页1442。

⑦清清凉道人撰《听雨轩笔记》卷三《馀纪》页342，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五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0月出版。

⑧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纪·隐帝乾祐三年》，第二十册，页9432-9446，中华书局1976年10月版。

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六十八《牛皋传》页11464，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

⑩宋周必大撰《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百四十六《奉诏录》卷一《回奏》：“有牛僕者，是皋之子”，页17，清道光28年瀛塘别墅藏板，第三十七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徽宗。”把神宗、哲宗次序弄错。此外第十七回称兀术驾下元帅奇渥温铁木真生下元朝始祖忽必烈，时代更是大误。

还有一处硬伤直接证实了作者的知识水平有限：第四十四回“梁夫人击鼓战金山，金兀术败走黄天荡”中写道：“至今《宋史》上一笔写着：‘韩世忠大败兀术于金山，妻梁氏自击桴鼓。’”案《宋史》原文是：“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①问题在于“执桴鼓”。冯梦龙也提到了这段故事，他的解读是：“梁夫人……亲自执桴，擂鼓助阵。”^②这里到底是“执桴击鼓”还是“击桴鼓”？显然“执”不是“敲击”的意思，《说岳全传》的作者肯定没有读懂原文。当然“桴鼓”也是一个独立词，但是《宋史》里与“执”连用，就必须把“桴”解读成“鼓槌”，否则以《说岳全传》的理解，“执桴鼓”只能解释成“拿起桴鼓”，实为不妥。

以上列举清晰地表示：钱彩、金丰都不是有文化底蕴的文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瓦肆书场，而非汉籍坟典。根据钱彩十分熟悉评话内容，可以进一步推论他可能就是说书人。而金丰步其后尘又不能改正钱彩的错误，说明他也只是略通文墨，仅仅关注作品的精彩程度而忽略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艺术成就，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书坊经营者。

钱、金二人不知书的间接证据还有：《说岳全传》虽然再版不断，但是有清一代没有一人作点评批注。（它的第一个批本是民国十八年上海会文堂袁韬壶批本。）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实在不值得批注。又兼钱、金二人身份低微、文名不著，文人骚客不屑与之交往，因此翻检清代笔记书牋找不到任何对钱、金二人的记录描述。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说书艺人钱彩编出一部《说岳全传》，书商金丰迎合市场需求，看好其销路有利可图，大致做了一些整理，就安排出版了。但是二人的文学修养、历史知识均十分欠缺，因此只能是一部迎合市民口味的、庸俗浅鄙的应时获利之作，压根儿没打算获得文人学者的青睐。

2、“乱生春色谁为主”——金丰改编钱彩原作之疑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江西巡抚郝硕奏缴《说岳全传》，当时的记载是：“《说岳全传》，十本，仁和钱彩编次，内有指斥金人语，且词多涉荒诞。应请销毁。”^③这里没有提及金丰，因此被禁的应当就是钱彩原本。清中叶浙江、南京一带通俗文

①《宋史》卷二百六十四《韩世忠传》页11361

②明冯梦龙撰《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页473，严敦易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

③雷梦辰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页11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9月版

艺作品大行，屡屡有禁而不绝的事例，《说岳全传》就是其中之一。钱彩原本日后彻底不行于世，除了被禁的因素外，它本身的质量不济是其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金丰的“增订”是成功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金丰究竟改变了多少钱彩原著？

因为缺乏文献资料作证，这个问题如今已成不解之谜，但是悉心翻检，仍可寻觅到些许蛛丝马迹。

很多人提到《说岳全传》前半部基本是历史演义，后半部却转而变成了神魔小说，暗示有金丰补作之可能。^①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种差异是金丰造成的。

首先岳飞后代的故事模式本就是凭空虚构的，没有史实作为蓝本，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发挥。钱彩一没有罗贯中的军事见识，二没有冯梦龙的文学技巧，他只能运用许仲琳的想象力，而这又最能吸引人，前文已提到，《说岳全传》面向的是大众读者，钱彩既然不需要向史实负责，为什么不可以肆意发挥？

其次《说岳全传》前半部中平杨幺一段已经有了神怪式的描写：第五十一回余尚文的“五雷法”、余尚敬的“驾云法”、鲍方老祖送牛皋“穿云箭”、“破浪履”、“丹药”等都是神仙方术的性质，因此从全书来看，前后并不抵触。

最后是书的篇幅，郝硕所禁钱彩原本为“十本”，与今本《说岳全传》各版本差别不大：嘉庆三年本，十册；福文堂本，九集。这说明金丰并不是整章整回地改写，而是小修小补。

而且作者对全书有清晰的整体规划，这从众多人物年龄上就能看出来。下面以岳云的年龄为轴，看看相对应的其他人年龄纵向、横向叙述是否合理。

书中明确标示岳云年龄共有三处：第二十一回“七岁”、第三十七、四十五回“十三岁”、第六十一回“二十三岁”。可以通过他人年龄推算出岳云年龄有二处：第五十一回，严成方十四岁，第五十二回，岳云年长一岁。则此时岳云十五岁；第四回岳飞拜会道悦之师志明长老时十三岁，第五十九回时隔二十年后拜访道悦，则岳飞此时三十三岁，故岳云十七岁。列表为：

	高宗即位	平杨幺			
	岳飞一败兀术	牛头山	岳飞下狱	风波亭	
岳云：1岁	7岁	13岁	15岁	17岁	23岁
岳飞：17岁	23岁		33岁	39岁	

（此表以《说岳全传》中的人物行年为准，非历史实际）

以下以陆文龙、关铃和牛通的年龄作为参照作考查文中前后叙述。

①于天池著《明清小说研究》页26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第十五回，金兀术首次南下破潞安州，陆文龙时年三岁。第五十五回朱仙镇鏖兵时，陆文龙奶妈自称已经离中原十三年，则此时陆文龙十六岁。那么陆文龙应当小岳云一岁，也就是高宗即位时陆文龙六岁，则兀术灭宋一役耗时三年，前后基本相合。

第四十回，关铃十二岁，小岳云一岁。第五十八回，描述他“年纪不上二十”，此时岳云十七岁，故关铃实际十六岁，相符。

第六十二回，牛通十五岁（第六十二回时间上已经是风波亭的下一年，故牛通的年龄也可按十四岁计算），则牛通出生时岳云八、九岁。查前文，果然，牛皋娶妻在第三十二回，也就是岳、牛等兄弟首次入伍之后、牛头山一役之前，同样不与岳云年龄状况矛盾。

显然作者对整部作品的人物有明确的设定，在时间跨度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仍然前后情节合拍。

与人物自身活动时间表周密确凿相对应的是作者对历史年号的随意处理。前文提及的宣和十七年只是一例，同样在岳云的军旅生涯中，也存在年号的重大纰漏：高宗即位后，岳飞接旨戎行，逻辑上应当是建炎元年，此时岳飞二十三岁、岳云七岁。历史上建炎年号凡四年，但是到了第四十五回，牛头山战役之后，高宗迁都、改元绍兴，此前牛头山战役时岳云已经十三岁，那么就是说作者认为建炎年号使用了六年以上。这首先是历史知识的缺乏，更因为作者根本未予年号以重视，以至于作品叙述本身就有矛盾之处：第四十五回改元绍兴元年，第四十七回召岳飞讨杨么时写作绍兴七年，但是按文中逻辑推算岳云此时十五岁，则过了七年岳云才长了两岁？接着在第六十一回，何立去找道悦“即绍兴十三年正月初一日”，此时是风波亭的后一天，那么绍兴七年到绍兴十二年五年时间里，岳云竟然长了八岁？！

说作者时间概念模糊是不确切的，因为前文已经分析了以人物活动为轴的时间的准确，只能说作者对自己创造的故事中人物活动方面构思甚详，才能够使得前后一致，但是他又对具体历史时间则不甚了了，没有认真核对，同时反映出作者因为没有明晰的故事底本可循，才造成细节上时间的吻合、大局上时间的混乱。

综合以上诸般情况，可以认为钱彩原本故事规模、内容梗概与金丰增订本即今本《说岳全传》差别不大。金丰的工作只是进一步在细节上修改、润色。即便如此，今本《说岳全传》仍存在不少的语焉不详、行文脱节的硬伤，比如：

第五十七回，兀术派鹞眼郎君领兵偷袭临安，这鹞眼郎君“被牛皋一铜打在肩膀上……牛皋取了首级。”但是第七十五回，“兀术随（疑为“遂”字之误）命撒离罕、孔彦舟、李董哈哩、鹞眼郎君四员骁将出马助阵。”这是明显的前后文

矛盾；《金陀粹编》提到有“鹞旋郎君”，此当是“鹞眼郎君”的原型。说明钱彩根本没有查阅原文。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岳全传》里的地名、人名多有所本，但是又不与史实出处相同，如“吉倩”作“吉青”、“酈延州”作“潞安州”、“周同”作“周侗”、“道月”作“道悦”等等。一二个不同属于作者失察，太多不同就只能说明是作者不知道原文如何了。^①

第五十八回，“公子道：‘……我乃武昌开国公太子少保统属文武兵马大元帅岳大公子岳云便是。’”这是把岳飞的官衔误写成了岳云的，或许是想写“某某大元帅的大公子，岳云便是”，总之是笔误无疑。^②

第五回，李春说：“只留下一个小女十五岁了。”周侗介绍岳飞：“虚度二八”。但是下文说李小姐的生辰八字“却与岳大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错漏明显。

第六十一回：

何立将秦太师陷害岳爷，“因他临死时曾有‘懊悔不听道悦和尚’之言语，故丞相命我来骗他到临安究治。”^③

这一句不通，应该在首句“……陷害岳爷”之后加“说与众僧听”之类的话，否则缺宾语不成句子。

这些问题反映了钱彩原本是多么草率粗陋，金丰肯定已经做了多处修改，但是仍然遗下这么许多纰漏。除了金丰学识有限，只能说钱彩原文错误太多，改之不尽。

3、“细看来不是杨花”——《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关系之疑

研究者的主流的看法是《说岳全传》脱胎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④那么究竟继承了多少内容？下面就把二书中标志性事件罗列出来，两相对比一番（划线者为二书相同、相似处）：

①或许有人认为“鹞旋郎君”是金国官名，因此可以重复出现。但是在小说里，作者是把它当成人名理解、使用的，因为与它并列的“撒离罕、孔彦舟、李荃哈哩”等皆是人名。

②这一句话也可以断句为：“……大元帅岳，大公子岳云便是。”这样的说法也有，那么此处就属于断句错误

③清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第六十一回“东窗下夫妻设计、风波亭父子归神”页5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6月版

④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云：“有《宋武穆王演义》，熊大木编；有《岳王传》，余应鳌编；又有《精忠全传》，邹元标编，皆记宋岳飞功绩及冤狱；后有《说岳全传》，则就其事而演之。”页10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版

《说岳全传》岳飞行迹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飞行迹
1~6回， <u>学艺</u> 、 <u>结婚</u>	7回， <u>学艺</u> ， <u>投康王</u>
7~12回， <u>武考</u> ， <u>与宗泽谈兵</u> ， <u>抢挑小梁王</u>	8回， <u>夺李固渡</u> ， <u>救东京</u> 10回， <u>见宗泽</u> ， <u>谈兵法</u> 11回， <u>越职上表</u> ， <u>投张所</u> 13回， <u>与王彦渡河</u> ， <u>战太行山</u>
13~14回， <u>平王善</u>	17回， <u>破王善</u> ， <u>驻健康</u>
15~20回， <u>兀术灭宋</u>	22回， <u>战健康</u>
21~27回， <u>入伍</u> ， <u>一败兀术</u>	23回， <u>破兀术</u>
28~31回， <u>平杨虎</u> 、 <u>万汝威</u> 、 <u>罗辉</u>	24回， <u>守宜兴</u>
32回， <u>就汜水</u> 、 <u>藕塘关</u> 。 <u>牛皋娶妻</u>	26回， <u>复健康</u> ，作《五岳庙记》， <u>斩戚方</u>
33、34回， <u>败粘罕</u> ， <u>计除刘豫</u>	27回， <u>楚州战挾懶</u>
35、36回， <u>平曹成</u> 、 <u>曹亮</u>	31~33回， <u>讨曹成</u> 、 <u>李成</u>
37~45回， <u>牛头山</u> 、 <u>黄天荡</u> ， <u>岳云出世</u>	35回， <u>平吉州彭友</u> 36回， <u>赐“精忠岳飞”旗</u> 38回， <u>破李成</u>
46、47回， <u>苗</u> 、 <u>刘乱</u> ， <u>居母丧</u>	40~42回， <u>讨杨么</u>
48~53回， <u>平太湖杨么</u>	43回， <u>母丧</u> 44回， <u>结怨王俊</u> 45、46回， <u>讨伪齐</u> ，作《小重山》 47回， <u>辞兵柄</u> ， <u>论马</u> 48回， <u>计除刘豫</u> 50回， <u>反和议</u>
54~59回， <u>朱仙镇</u> ， <u>返京</u>	54回， <u>进驻堰城</u> 55回， <u>杨再兴战死小商桥</u> ， <u>进驻朱仙镇</u> 56回，作《满江红》， <u>十二道金牌召回京</u> 60回， <u>升枢密副使</u> 61回， <u>不同意张俊分韩世忠军队之议</u> 62回， <u>辞官</u> 63回， <u>王俊告岳飞</u> ， <u>访道月</u>
60、61回， <u>风波亭</u>	64~66回， <u>下狱</u> ， <u>死于风波亭</u>

通过上表之对比，可以明确看出《说岳全传》在岳飞军事生涯的主线故事的

描述上基本不同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但是二者在某些细节的相同却印证着《说岳全传》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借鉴：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十回、《说岳全传》第九回，岳飞与宗泽谈阵法时的话如出一辙，但均不同于《宋史》的记载。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六十六回所引悼念岳飞的诗文中，有三首与《说岳全传》第六十一回的诗文相同，其中《说岳全传》所引的祭文较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少末一句。不过这些诗文虽然相同，却不能认为必然是《说岳全传》摘引自《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因为这些诗文并不是《大宋中兴演义》的创作，它也有所本（可能是袁纯编《精忠录》），那么“说岳”当然也可以直接引用，这里只不过是二书引用了同一本书而已。

此外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李若水骂金、康王泥马渡江、疯僧讽秦、施全行刺等等，但是这些故事早已见于其它题材的作品的记载，很难断定《说岳全传》取材于何处。至于“中兴”第十六回山东关胜抗金，“说岳”第三十六回勾容呼延灼抗金，应该是来自于不同渠道的传说，同类还有戚方、王俊等事件。以上三件，二书叙述不同，但是又性质相近，难以断言《说岳全传》是独立取材还是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既成故事的再创作。

前文提到了《说岳全传》对历史时间叙述的混乱，那么《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如何呢？《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每卷起首都标注时间，如卷一“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卷八“起绍兴十一年辛酉岁，止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岁，首尾凡十五年事实”^①等等。因为它是以《宋史·岳飞传》为故事底本的，因此各段时间准确，与《说岳全传》大相径庭。这样的差别说明《说岳全传》绝不是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为蓝本创作的，否则钱彩只要直接把相对应的时间抄进书中即可，何必自己明明不知道却胡编乱造、自露其短？

作为一部不遗余力地歌颂岳飞的通俗作品，《说岳全传》竟然没有引用一篇岳飞的诗文词作品，反而生造出牛皋、吉青入援帮助平定苗、刘之乱的情节，而历史上岳飞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功劳。同样，韩世忠没有诗文流传，但是小说第四回却硬是让他吟了一首《满江红》（当然不是岳飞那首），难道作者弃现成的的素材不用，只喜欢自己的凭空创造？实在蹊跷。可以正面彰显岳飞文采的《满江红》、《小重山》、《五岳庙盟记》诸篇皆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赫然在列，作者再发挥也不会弃实取虚，未免于理不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有一个：作者不

^①明熊大木编辑《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卷八，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本，1990年版。

知道岳飞的诗文。《满江红》的真伪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以其流行程度来说，堪比《前后出师表》之于诸葛亮，在与生造的素材的比较中，绝无被弃置不用之理。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钱彩的《说岳全传》自有底本（评话演出本），他根本没有全面阅读、研究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他单独征引了其它题材作品，但是因为时间的发展，这些作品本身也在变化，这才造成《说岳全传》具体情节与熊大木所引的故事的不同。但是在目前史料的范围，尚不能排除钱彩利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可能，只不过这种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到这里可以作如此的结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也是《说岳全传》的素材来源之一，可是由于《说岳全传》吸收的故事素材实在庞杂，致使二书的主线故事流程差别太大，所以不能简单结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为《说岳全传》的蓝本。

行文至此，可以推测得出如下的信息：康雍时期的说书艺人钱彩编辑出的《说岳全传》颇受南方大众欢迎，乾隆九年，小书商金丰迎合市场需求，小修小补地整理了一番，包装推出。而钱彩的原书一些嬉笑怒骂内容触及清人忌讳，被江西巡抚郝硕奏缴禁止，逐渐不行于世。金丰的改编本却保存下来，并逐步扩大影响，流行至今。

总 结

拙文关注的只是细枝末节，偶有新见，也绝难与他文动辄改写历史的成就相比，权将拙文新发现罗列如下：

理清小说《精忠录》与诗文集《精忠录》的关系，指出李春芳《精忠录序》实为诗文集而作，非小说；指出萃锦堂本《精忠录》不能归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版本系统；指出大连图书馆藏“金氏余庆堂”初刻本为伪，吉林大学图书馆藏顺治年间宏道堂本断年有误；整理建国后标点本《说岳全传》的二个底本：务本堂本和锦春堂本的各自体系，断锦春堂本为道光刊本；驳今本《说岳全传》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重新考证乾隆九年成书说；列出明前期岳飞题材传奇的递变关系；考“华车”在清初的词义为战车，作者用来形容冲车、撞车，并考“滑车”为定滑轮；考“通书”名称的渊源；考作者钱彩、金丰的身份是评话艺人和小书商，文化程度不高；提出《说岳全传》的“钱彩原本”和“今本”概念；考《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不是《说岳全传》的故事底本等。

拙文是一篇文献学（或称校雠学）论文，试将拙文拆分，还原成文献学的各分支学科：《版本流变》可归入版本学；《成书年代》、《故事演变》、《辨疑》可归入目录学；《华车》、《杂考》可看成对《说岳全传》的注释。愚自觉文浅义俗难堪“论文”二字，因此拙文莫若说是对《说岳全传》这部古籍的整理成果而已。

拙文使用到的古籍整理的方法以考证为主，此《序论》已有提及，乃有意为之，贯穿通篇。最典型的成果应当是《华车》、《杂考》二篇。按考据之法分考书和考史两种，而拙文只集中用力在《说岳全传》本身，一方面愚力有不逮，不敢妄为；另一方面是《说岳全传》与史实相差太大，无由以之证史。古籍整理的其他方法亦有尝试，如校勘，对校了务本堂本与锦春堂本；注疏，找出“鹞眼郎君”的出处、论证“执桴鼓”的错误、指出“岳大公子岳云”的标点错误等等。

拙文内涵有限，考据未详，仓促草就，不惟贻笑方家，观此文者定皆讪然，一念至此，汗流浹背。愚本樗栎，焉敢属文？艳羨同侪诸君凤鸣高冈，聊做啁啾之声而已。

参考书目

- [1]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9.
- [3] 清敕编.《日讲〈礼记〉解义》[M].四库本
- [4]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7] 晋陈寿,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9] 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0] 唐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1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3]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4]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5] 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6]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7]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8] 清查继佐.《罪惟录》[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3.
- [19]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0] 汉刘向.《战国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21]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2] 汉赵晔.《吴越春秋》[M].四库本
- [23] 唐陆广微.《吴地记》[M].四库本
- [24] 宋岳珂.《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5]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26] 清允禔等.《钦定大清会典》[M.]四库本
- [27]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8] 清敕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M].四库本
- [29] 清敕修.《皇清职贡图》[M].四库本
- [30] 晋干宝.《搜神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31] 唐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2]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3] 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4] 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M].四库本
- [35] 宋吴自牧.《梦粱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36] 宋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7] 宋周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8] 南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39] 元王祜.《农书》[M].四库本
- [40] 明无名氏.《杨家府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41] 明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1990.
- [42] 明唐顺之.《武编》[M].四库本
- [43] 明朗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44] 明周祈.《名义考》[M].四库本
- [45]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6] 明邓玉函,王徵.《奇器图说》[M].四库本
- [47] 明董说.《七国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48]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收入《李渔全集》第七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49] 明朱橚.《普济方》[M].四库本
- [50] 明顾起元.《说略》[M].四库本
- [51]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52] 明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 [53]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4] 清钱彩,金丰.《说岳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1990.
- [55] 清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本,1983.
- [56] 清吴璿.《飞龙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1990.
- [57] 清褚人穫.《坚瓠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58] 清何焯,陈鹏年.《御定分类字锦》[M].四库本.
- [59] 清如莲居士.《薛仁贵征东》[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 [60] 清文康.《儿女英雄传》[M].上海:上海书店,1981.
- [61] 清蕊珠旧史.《京尘杂录》[M].上海:上海进步书店石印本.
- [62]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3]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 [64] 徐珂编.《清稗类钞》[G].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5] 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G].成都:成都古籍书店,民国24年.
- [66]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67] 宋曹勋.《松隐集》[M].四库本
- [68]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M].道光28年.
- [69] 元钟嗣成.《录鬼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70]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1959.
- [71] 明王绅.《继志斋集》[M].四库本
- [72] 明刘嵩.《搓瓮诗集》[M].四库本
- [73] 明温纯.《温恭毅集》[M].四库本
- [74] 清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M].上海:大东书局,民国19年.
- [75] 清张大复.《快活三》[M].北京: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
- [76] 清李玉.《李玉戏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77]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G].四库本
- [7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79]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80]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81] 陈垣.《陈垣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8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83] 郑振铎.《西谛书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84]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85]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86]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87]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8]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9] 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90] 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 [91]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92] 陈汝衡.《宋代说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 [93] 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94]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95] 刘镇伟.《大谷本明清小说叙录》[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
- [96] 大连图书馆参考部.《明清小说序跋选》[G].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 [97]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6——1986 图书总目》[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98] 《中华书局图书总目 1912——1949》[G].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9] 《古籍目录 1949.10——1976.12》[G].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0] 王清原,牟仁隆,韩锡年.《小说书坊录》[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题王清源、韩锡年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101] 杜颖陶,俞芸.《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02] 《才子佳人小说述林》[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 [103] 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104] 王宜庭,石昌瑜.《英雄酒、凡人泪——古代章回小说卷》[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105] 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106] 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07] 李绍先,王晓琳.《明清小说话幽》[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 [108] 杨玉奎.《古代刑具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 [109] 陈绪万,尚永亮.《明清小说观止》[G].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110] 李时人等.《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 [111]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112] 周芜.《中国版画史图录》[G].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 [113] 马文大,陈坚.《明清珍本版画资料丛刊》[G].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 [114] 邓骏捷.《岳飞故事的演变》[J].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3:127-150.
- [115] 李琳.《〈说岳全传〉“说本”来源和乾隆成书说新证》[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5):151-154.
- [116] 林香娥.《岳飞题材小说戏曲的历史演变》[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2):95-101.

后记·谢辞

拙文草创于〇五年上半年，寒假中读《说岳全传》，做读书笔记十余条，其中一条是关于“华车”的，开学后写成一篇短文，就是后来的《“华车”小考》，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发轫之作，得到周老师来回数次修改，甚至用词、注释格式也不厌其烦一一指点，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当时的不开窍赧颜。此后基本上按一学期一篇的速度，陆续写成《成书年代研究》、《版本流变》诸篇。到研二开题时，周老师冠之以《〈说岳全传〉丛识》之名，规模甫定。

三万六千言字数虽少，但也用去了将近两年时间，从第一篇《“华车”小考》到最后一篇《杂考八则》都是名物考证，似乎冥冥之中完成了一个轮回，以此文作为我硕士三年的纪念再合适不过。回望写作经历，也颇自得其乐，比如没有完成贾老师“唐史史料学”的学期论文，就用《“华车”小考》鱼目混珠；《成书年代研究》一文没有达到周老师的要求，我却偷着花钱发表……

搁笔之际，想起了黄永年先生。〇六年九月，司瑞江师兄和我登门向黄先生求教。就《说岳全传》黄先生谈了三点，其中提到牛皋笑死一段故事的来源值得探究。可惜我愚笨太甚，始终没有找到正解，只得放弃这个题目。不想三个月后黄先生就撒手西归。论文虽完，题目未完，不做出此题，我始终于心难安，然而出题人已去，做题人又当如何？

文章词句数目可以计算，但写文章时获得的助益却无法计算。首先要感谢恩师周晓薇教授，周老师不仅授我学业，更教我做人。我始终觉得没有周老师的耐心教导，就不会有我的第一篇文章，更不会有后来的这一系列文章，是周老师帮助我树立了敢于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的信心，周老师对我恩同再造，终我此生难报师恩于万一。

还要感谢贾二强教授，我在陕师大七年，共上了贾老师讲的五门功课，贾老师是教过我课程最多的老师。字字句句、点点滴滴都是贾老师心血，学生受益终生。更要感谢古籍所所有老师，因为我幸运地上过古籍所所有老师的课，计有：赵望秦老师、王其祎老师、王雪玲老师、焦杰老师、黄寿成老师、张文安老师、张艳云老师等，这一点我始终引以为豪。

当然也要感谢同门王灵师姐和司瑞江师兄，感谢綦中明、党斌、张素红、包小飞诸友，同窗情谊，自不待言。

我实一朴橄，居衡茅之下，千虑而无一得，今后无论怎样，只要不给诸师长丢脸，则我愿足矣。

丙戌季冬下浣 邹赫识于西安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 邹贺（署名“邹赫”）. “华车”小考[J]. 文博, 2006, 5:53-57.
- [2] 邹贺. 《中古墓志词语研究》摭瑕——兼与罗维明先生商榷[J]. 碑林集刊, 2006, 12:257-264.
- [3] 邹贺（署名“邹赫”）.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研究[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1:21-23.